

# 感傷與抗爭政治： 許邦和革命之路的情感因素（1925-1930）<sup>\*</sup>

盧 華<sup>\*\*</sup>

## 摘 要

革命青年捲入政治、參加中共以及中共革命的勝利過程中，情感發生過至關重要的作用。本文試圖以交通大學學生許邦和的日記為中心，結合同時代其他相關日記、資料，從情感視角出發，自下而上地重建青年學生加入中共革命的情感機制、心靈世界。由許邦和日記可以看出，後五四的背景，新文學和各式新式觀念流行，以及青年學生思想「解放」後所面臨的家庭生活和戀愛經歷，讓城市裡的青年普遍存在著的煩悶加重，繼而引發對日常生活和人生的感傷情緒。1920年代後期，對社會現實的失望和日常生活的不滿，讓這一煩悶心境和感傷情緒引發激烈的人生觀危機。各式革命文學和馬克思主義書籍的流行以及日常生活的情感挫折促使許邦和痛苦反省自身的「資產階級」身分，在懺悔和克服感傷情緒的過程中，他試圖通過閱讀和理論思索來擺脫日常生活的苦悶與瑣碎，堅定了加入抗爭政治的意志。許邦和期望加入一種更加平等與友愛的組織、一個情感的避難所，並在組織中尋求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和面向未來的正義化事業，將感傷情緒的克服融入到重塑自我與世界的行動中去。

**關鍵詞：**革命青年、許邦和、情感史、感傷、抗爭政治

---

<sup>\*</sup> 本文在寫作和修改過程中，曾先後受到過許紀霖、李志毓、黃江軍、呂彥霖、盛差偲、馮建倫、靳帥等同事和師友的修改建議。在上海交通大學查閱資料的過程中，許邦和侄子許國源先生、交大校史館及檔案館的歐七斤副館長和周小燕老師給予了重要幫助，兩名匿名評審專家提供了寶貴的意見，在此一併致謝。文責當然由筆者自負。

收稿日期：2022年7月25日，通過刊登日期：2023年5月15日。

<sup>\*\*</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中國歷史研究院近代以來中國歷史學知識體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 一、前 言

自歷史研究不斷「下行」以來，眾多二十世紀歷史上默默無聞的中下層人物被歷史學家「發現」，逐漸成為歷史敘事的主角之一。激進學生和青年的情感、交誼及其組織生活經驗開始得到革命史研究者的關注，一個更為複雜的歷史與思想、情感世界逐漸呈現。

青年加入革命組織的原因和機制複雜而多元，相關研究多集中在理性化的意識形態或以「主義」視角出發的思想領域。從不那麼知性或理智化的情感和心靈角度，尤其是以自下而上視角探討青年加入革命組織的情感機制的研究比較匱乏。<sup>1</sup>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就曾指出，中共高度依賴情感工作，情感是重訪中國革命的核心要素。<sup>2</sup>這番洞見並沒有得到重視，裴宜理也未進一步指明情感的來源、類型以及青年加入革命過程中具體情感的運作機制。王汎森從「主義」與日常生活的關聯出發，具體探討了青年基於自發心態主動擁抱「主義」背後的情緒（煩悶）脈絡。<sup>3</sup>雖然青年擺脫煩

<sup>1</sup> 情感與革命史（尤其中共革命）結合的研究進入中文學界較晚，大陸學界目前還停留在情感史理論引介與消化的層面。比如王晴佳，〈為什麼情感史研究是當代史學的一個新方向？〉，《史學月刊》，2018年第4期，頁5-10；〈拓展歷史學的新領域：情感史的興盛及其三大特點〉，《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4期，頁87-95；〈口述證言能否成為歷史證據？——情感史研究對近現代史學的三大挑戰〉，《社會科學戰線》，2020年第5期，頁104-117。李志毓，〈情感史視野與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研究〉，《史學月刊》，2018年第4期，頁14-17。但有少數學者從不同的學術理路做了精彩探討，比如黃道炫就從心靈史和戀愛等日常生活中的幾個側面做了關於革命情感的部分研究，如〈「二八五團」下的心靈史——戰時中共幹部的婚戀管控〉，《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1期，頁4-22；〈整風運動的「心靈史」〉，《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2期，頁4-26。筆者的情感定義廣義上含括黃道炫所稱的「心靈」面向，它包含日常生活的情緒、意志和欲望等內在非知性化的活動。跟筆者的思路較為接近的是劉奎探討郭沫若的論文，〈浪漫如何介入歷史：抗戰初期郭沫若的抒情詩學與情感政治〉，《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6期，頁118-140；以及汪正晟從青年自我意識塑造出發討論青年對延安整風的迎拒問題，見〈青年自我與延安整風〉，《新史學》，卷32卷期1（2021年3月），頁117-172。

<sup>2</sup> 裴宜理，〈重訪中國革命：以情感的模式〉，《中國學術》（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輯8，頁97-121。

<sup>3</sup> 王汎森，〈「煩悶」的本質是什麼——近代中國的私人領域與「主義」的崛起〉，以及長文〈「主義時代」的來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一個關鍵發展〉，收入氏著，《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7），頁113-163、165-250。

悶的欲求讓 1920 年代革命政黨的「主義」呼籲更具吸引力，促成了知識青年對革命「主義」的擁抱。但廣義上的煩悶情緒是否直接發生作用，青年的情感中煩悶是否是唯一起作用的情感，有無更精細化的情感介質和表達？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如何與抗爭活動、參加革命組織關聯起來？王文並沒有深入回答這幾個關鍵問題。筆者試圖沿著這條線索，結合日記等文獻資料，挖掘出煩悶之下強調情感表達和親密感的感傷情緒，<sup>4</sup>並自下而上地重建部分青年選擇加入中共革命的具體而微的情感機制。

另一方面，相比於 1919 年「五四」、1920 年代中期和 1935 年「一二·九」運動中（三八幹部一代）加入中共的知識青年，交通大學學生許邦和（1911-1934）成長的 1928 年至 1930 年代初少為學界所關注。<sup>5</sup>許並不完全符合近來部分研究突出的「中小知識青年」或「沒落士紳家庭」背景的革命青年，他是屬於無法簡單歸類、卻又與革命的各個方面聯繫在一起、家庭條件優渥的青年。許邦和祖籍浙江吳興（今湖州），辛亥革命那年出生於上海，小學畢業之前生活於蘇州。曾祖父許春榮（1839-1910）藉上海開埠之際從事紡織業發家，後曾開設錢莊、擔任花旗洋行買辦。<sup>6</sup>因大家庭內部經營矛盾等原因，許邦和父親許頌葵於 1919 年攜小家庭遷往天津。大商人的家庭背景，使得許邦和及其兄弟姐妹享受了優良教育，他們都曾就讀和畢業於當時的全國私立名校、由著名教育家張伯苓主掌的南開中學。許邦和於 1922 年考入南中，1928 年畢業，進入交通大學。<sup>7</sup>

<sup>4</sup> 關於「感傷」，筆者定義大體接近於威廉·雷迪（William M. Reddy）對「感傷主義」（sentimentalism）的理解，它融匯了 emotion、sentimental 以及 mood 這三種類型的情感，特別強調情感表達和平等化的親密感的重要性。見氏著，周娜譯，《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頁 192-194。

<sup>5</sup> 這部分是因為，這一時期的中共不僅面臨著組織和政治路線的「左傾」錯誤與路線分歧，城市的地方黨組織遭受反覆破壞和黨員發展乏力的困境。見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頁 88-100。

<sup>6</sup> 參見 <http://www.shtong.gov.cn/newsite/node2/node2245/node74728/node74749/node74773/node74775/userobject1ai89589.html>（2022 年 6 月 29 日檢索）。

<sup>7</sup> 南開中學自 1904 年創辦起，即為四年制，後有四年制、六年制和七年制三種。見〈許邦和同志生平簡介〉（1981 年 4 月），上海交通大學檔案館藏內部檔案，總號 3796，檔案號 RW-許邦和-01。

據許邦和透露的訊息，他至少寫過六冊的《生活錄》。<sup>8</sup>但筆者所見只有交大檔案館所藏的後四冊，這四冊日記始於 1929 年 3 月 19 日，結束於 1930 年 6 月 11 日。這份日記是作者用於記錄日常學習、閱讀，表達自己對家庭、朋友、學校和社會的意見、態度以及私人情感。本文並不試圖通過這份私人日記來反映上海甚至交大革命學生的生活全景，而是以這四冊日記為主，結合作者本人的活動、文章和其他資料，參照同時代青年日記，重建當時青年學生的情感、閱讀與政治思考為主的生活世界，並藉此個案再現部分青年走向革命、加入中共的情感機制與抗爭政治的邏輯。<sup>9</sup>從情感政治的角度，本文試圖探討以往革命史和思想史在研究此一歷史階段時相對忽視的幾個問題：1920 年代末期以許邦和為代表的城市革命青年有著怎樣的情感體驗？情感如何影響他的日常生活、閱讀和心靈世界？擺脫消極而浪漫的感傷情緒又如何讓他堅定了加入革命組織的意志？這一情感政治與中共以民族和階級之愛為主導的「主義」又有何聯繫與區別？

## 二、從煩悶到感傷：青年的覺醒與痛苦

許邦和在南開中學就讀六年，深受五四新文化運動後新思潮、學生運動和北方政局變化的影響。時代風潮和各色讀物的瀰漫，知識青年多存在煩悶無聊的心境。<sup>10</sup>對青年而言，最容易引起人生與日常生活之煩悶與瑣碎感的是家庭和戀愛生活。

---

<sup>8</sup> 許邦和，《生活錄（一）》，1929 年 5 月 21 日，上海交通大學檔案館藏，歷史檔案 3-469。這份日記由作者的高中和大學同學、密友王楓和張會沅保存，並於 1981 年提供給上海交通大學檔案館。本日記共四冊，見該館館藏：歷史檔案 3-469、3-470、3-471、3-472；日記無確切頁碼標示，凡引文中括弧後的語句，除按語標明為筆者所加外，均為許本人文字，後不贅述。

<sup>9</sup> 「抗爭政治」來源於英文 contentious politics，參考自裴宜理著，閻小駿譯，〈底層社會與抗爭性政治〉，《東南學術》，2008 年第 3 期，頁 4-8。

<sup>10</sup> 王汎森，〈「煩悶」的本質是什麼——近代中國的私人領域與「主義」的崛起〉，《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頁 148-159。

傳統中國社會中，家庭不僅承擔著祭祀禮儀、傳宗接代、培養年輕一代謀生和適應社會的能力，它還是安頓人生意義和解決生活問題的重要支撐力量。晚清以來，傳統的儒家綱常和宇宙觀逐漸瓦解，個體被拋入一個變動不安的時代中。<sup>11</sup>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 1923-2006）指出，革命在開創新文化的同時，以同樣的方式解放了對「過去」的理解。<sup>12</sup>晚清以來家庭社會結構和價值觀念持續解體，受五四影響的眾多青年紛紛把「自我」置於「家庭」的對立面。這首先就表現在青年對「自我」、個人意志受家庭和社會束縛，無時不渴望擺脫的煩悶及感傷情緒中。

思想上被「解放」的後五四青年心中，「封建大家庭」早已不再具有儒學中的地位，甚至被汙名化。經過各色新式雜誌、報刊媒體和「反傳統」一代知識分子的建構與渲染，家庭成爲束縛青年的「桎梏」。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解放思潮更帶來家庭領域的革命以及對孝道倫理核心地位的衝擊。<sup>13</sup>對這一時代認知，許邦和多次表露共鳴，「對於這以父權爲中心，行使著無可再忍受的慘恨的威嚴的『家』呀，我究竟什麼時候，才能痛痛快快，仰著頭，離開你呢？」<sup>14</sup>實際上，許的父母是清末新式青年代表，許父不僅實行一夫一妻制，更拒絕了大家族裡普遍吸食鴉片的陋習，移家於天津。許母不僅接受過教育，能識字寫信，且頗具反抗精神，期望那種一夫一妻、以獨立人格和愛情爲基礎的現代小家庭。只是，在許邦和這一代更激進、更「新式」的青年眼裡，父母那一代的「新」早已不符合五四後的時代要求，屬於需要被揚棄的時代精神。<sup>15</sup>

<sup>11</sup> 張灝，〈中國近代思想的轉型時代〉，《時代的探索》（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4），頁 37-60。

<sup>12</sup> Reinhart Koselleck, "Historical Prognosis in Lorenz von Stein's Essay on the Prussian Constitution," in *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 trans. Keith Trib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60.

<sup>13</sup> 參見趙妍杰，《家庭革命：清末民初讀書人的憧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頁 121-177。

<sup>14</sup> 許邦和，《生活錄（二）》，1929年7月19日。

<sup>15</sup>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中的「未來」〉，《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頁 277-306。

父母與追求「解放」和個性的青年之間的家庭矛盾往往被後者過度解讀。因正常瑣事引發的任何小矛盾或衝突，都有可能固化他們從書本或報刊上得來的理解，即家庭是壓迫他們的。因許父「阻止自己去日本」、「想讓自己接受家族生意做經理」，甚至連自己「借給友泉 60 元父親就暴跳如雷」，對許邦和而言，家庭成爲「一座陷人的墳墓」。<sup>16</sup>思想並不激進的青年季羨林也多次在日記中直陳，「家庭幾成苦悶的源泉」。<sup>17</sup>面對生活矛盾和青年念想的「不被理解」，許邦和不得不在日記中痛斥父子關係的不合理，與母親通信中，許邦和抱怨父子關係的惡化。許母用來安慰許邦和的家庭溫情話語，也值得懷疑。羅志田即指出，家庭與社會、國家的一個重大區別，本來是有情。<sup>18</sup>在許眼裡，這些親情和背後以家庭爲基礎的傳統「忠孝」觀念，已經要被打入「歷史的垃圾堆」。<sup>19</sup>進一步說，對家庭的汙名化與新文化運動「反傳統」思潮背後的時間觀念有重要關係。進化觀念主導下，「過去的」和「中國的」不再直接與「真善美」掛鉤，不同時代有不同的道德、價值觀念和奮鬥方向。<sup>20</sup>如許邦和所言，「父親們底時代必然的與兒女們底時代不一樣的，兒子們努力的方向也不可避免地要與父親們底有所兩樣。」<sup>21</sup>

被激進解放思潮攪動的青年，他們對待生活中的習俗和現實政治生態的一般態度產生巨大差別。民國時期，青年學生對現代情色小說的癡迷非常普遍，這既是社會傳統習俗解紐和新式學校教育的結果，也是追求「解放」後青年探索新型兩性關係和婚姻的好奇所致。許邦和曾將英國著名作家戴維·勞倫斯（David H. Lawrence, 1885-1930）於一戰期間創作的小說《虹》（*The Rainbow*）

<sup>16</sup> 許邦和，《生活錄（一）》，1929年3月23日。

<sup>17</sup> 季羨林，《清華園日記》（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5），頁303。

<sup>18</sup> 見羅志田給趙妍杰書《家庭革命》所寫的序言，趙妍杰，《家庭革命：清末民初讀書人的憧憬》，序頁18。

<sup>19</sup> 許邦和，《生活錄（四）》，1930年5月10日。

<sup>20</sup> 科塞雷克對現代社會轉型的「鞍型期」分析有異曲同工之妙。他指出，傳統的觀念、概念因爲時間化（*Verzeitlichung*, *temporalization*）而獲得了此前沒有的「期待特徵」，過去的經驗很難直接指導當下和之後的歷史。Reinhart Koselleck, "Introduction and Prefaces to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trans. by Michaela Richter,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oncepts*, 6:1 (Summer 2011), p. 9.

<sup>21</sup> 許邦和，《生活錄（三）》，1929年10月11日。

寄給姐姐閱讀，卻因書中充斥著對性的心理描寫和現代親密關係的刻畫，被許父斥為「淫書」。面對父親的責罵，許邦和痛感「爛家庭關係，有如根濕漉漉的臭粗繩，不但束縛，還要有臭味」。<sup>22</sup>其實，這本小說在其誕生地英國，也因「有傷風化」和其中的反戰內容被禁毀，作者本人還不得不開始流亡生活。

當然，家庭不只帶來負面情緒，它總有溫情和相互關懷之處。來自兄弟姐妹和親戚的關心、禮物會讓許邦和時常感受到溫暖，尤其是當他獨自來到上海之後。「昨天下午接到家裡一個包裹，有妹妹做的 Cocoa 糖，家裡做的鞋子，大褂等，夾著包回來時覺得有異趣，這無形中被『家』這件東西征服了一時。」<sup>23</sup>許邦和與母親的密切關係曾讓他對家庭保留些許期待，如同蕭紅一樣。雖然蕭父有家暴行爲，讓她不得不在 20 歲時逃離家庭，但爺爺和伯父對她的照顧和教育卻讓她從未忘記家庭的溫暖。<sup>24</sup>只是，對許邦和而言，和其他家人以及偶爾與父親的親情往往很快被家庭束縛壓抑的想法代替。連姨母給他寄來禮物，也會讓許邦和聯想到大家庭制度對個性獨立的親情束縛。「姨母家饋送來食物四樣，擺脫不了的糾纏，只好又去電話致謝。」<sup>25</sup>但離開家庭是困難的。畢竟，它既有童年美好回憶，有對父母和兄弟姐妹之間的親情羈絆，更有現實的經濟因素。

青年學生個人生活的一切，從衣食住行到讀書、交際和旅遊，無一不需要家庭的支持。許邦和在日記中哀歎，家庭正是「以親子情同經濟這兩樣狠毒的鉗鎖來關住一群慕自由『兒郎』的孩子們」。許坦承這是時代犯下的「罪孽」。<sup>26</sup>他意識到，沒有錢，自己生活的一切，從學校生活、購書刊、交友到談戀愛都無從開始。<sup>27</sup>大學期間，學生苦於學業困難多想回家放鬆，暫時擺脫

<sup>22</sup> 許邦和，《生活錄（四）》，1930年5月10日。

<sup>23</sup> 許邦和，《生活錄（一）》，1929年4月13日。

<sup>24</sup> 蕭紅著，文明國編，《蕭紅自述》（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14），頁16-17。

<sup>25</sup> 許邦和，《生活錄（一）》，1929年5月20日。

<sup>26</sup> 許邦和，《生活錄（二）》，1929年7月19日。

<sup>27</sup> 與許邦和同齡的季羨林，雖然一樣衣食無憂，且在外讀書很難擺脫撫養家庭瑣事影響。他也多次在日記中抨擊家庭作為「負擔」，感歎經濟不獨立就擺脫不了家庭的壓迫。見氏著，《清華園日記》，頁17、130。

課業的苦惱。可是真正回到家之後，許卻發現煩惱無法消散。這種擺脫不掉的煩悶帶給青年的是束縛般的牢獄感和感傷：

在上海惦著要回來要回來，如今才悟到這是牢獄一座而已。自從我稍稍能想以來，這一向是我底牢獄，沒有一時同這家有好感的原故，該不是我負責的。<sup>28</sup>

家庭尤其是父親資助不可或缺的事實，對家庭和父權的抨擊不得受限。煩悶心境和家庭整體氛圍讓許邦和特別期待新的親密關係和情感表達空間，並熱衷於在信件、戀情和各色社會活動中去緩解此一感傷情緒。<sup>29</sup>

日記中，許邦和記錄了兩段戀情和一個曾經暗戀過的對象。這兩段戀情給予許邦和的既有短暫的快樂、幸福，有等待對方回信時的煩悶、苦惱，更有戀愛期間觸景生情的傷感以及失戀後的痛苦反省。許父雖遷家天津，但許氏大家族仍然居住在蘇州。許邦和的第一段戀情即始於他假期去蘇州旅遊，卻意外碰見小學同學謝寶瑾。此後兩人戀情基本上靠信件維繫。許邦和本期望一段戀情，滿足自身對親密和情感表達的需求。悖謬的是，戀愛本身不僅沒能解決問題，戀情期間的挫折反而加劇青年人的苦痛與感傷。許多次感歎：

擔負著一切的矛盾的苦楚而戀著一名女孩子，到現在，終於以去信不答，一種固執的無迴響，給自己套上了無名的煩惱的悶網，緩緩地加著速度，在心上刻畫起「煩悶呀，煩悶呀」的惡性的不安來！<sup>30</sup>

對方的不及時回信，無聊、感傷甚至憂鬱就會佔據身心，耽誤學習和許邦和最感興趣的課外閱讀。<sup>31</sup>

<sup>28</sup> 許邦和，《生活錄（二）》，1929年7月19日。

<sup>29</sup> 李海燕（Haiyan Lee）指出，後五四的戀愛觀中，啓蒙感覺結構的建立使通常的男女情感和自由戀愛往往與推翻儒家的家庭秩序聯繫在一起。見氏著，修佳明譯，《心靈革命：現代中國愛情的譜系（1900-1950）》（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頁101-103。

<sup>30</sup> 許邦和，《生活錄（三）》，1930年2月19日。

<sup>31</sup> 魯迅就曾諷刺，「現在的青年的腦裡的大問題是？……大概很不少，或者有許多是戀愛，婚姻，家庭之類罷……是的，他們確有許多人煩悶著，正在討論這些事」。見魯迅，《幸福的家庭》，原載1924年3月上海《婦女雜誌》月刊第10卷第3號，收錄於《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卷2，頁35。



新式女性與男性的戀愛關係中，如何保證個體的獨立和自主是個核心問題。雖然青年男女戀情多以「自由」、「平等」為口號，但女性所受教育情況與男性差別很大，且女性在家庭和兩性觀念方面「被解放」程度往往更差，她們的獨立自主和個性無法充分彰顯。對許邦和這一類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精神影響的青年學生而言，女性如何「解放」是社會的普遍問題。充斥於許邦和日記中的內容，是「創造女性」的複雜問題。

許邦和認為，戀情中「有一件東西，對於人，比聰明的頭腦還有價值，那就是一個完整的靈魂」。<sup>32</sup>完整靈魂最需要的就是獨立和自主。謝寶瑾在蘇州受過新式教育，但停留於中學階段。在許邦和眼裡，謝寶瑾之類的新式女性，作為浪漫想像中自由而自主的情人，比一張「白板」沒多多少內容：

然而就她們連「常識」都缺乏這一點來看，「灌輸」是必要的，不過這又不叫做「創造」了。（一個是客觀的輸入，讓她們自己去行消化；一個是主觀的說教，創造成自己理想的她，供自己一人的滿意，或是「欣賞」（這詞兒用得糟了）你以為如何？<sup>33</sup>

但這樣的情人為許邦和去「教育」或「填充」他想要的內容提供了可能。這正是李海燕概括的啓蒙情感結構：「在操作層面，啓蒙的感覺結構把這種情人簡化為一張擦拭乾淨的白板（*tabula rasa*），可以在其中展開一種對於人類群體形式的全新想像。」<sup>34</sup>不管許邦和所謂的「常識」是什麼，抑或它是否是「常識」，「啓蒙者」或「革命者」的啓蒙邏輯裡，最終必須忽略其啓蒙或教化對象的主體性，以啓蒙者的「灌輸」結束。這是啓蒙的一個核心難題。啓蒙者和被啓蒙者在知識話語和理性程度上的差別是不需要質疑的，但啓蒙者本身是否有足夠的權威和正當性去教化、啓蒙被啓蒙者？被啓蒙者個人的意願和意見是否需要得到重視和嚴肅看待？許邦和自己也疑問滿腹。「請想，我們『創造』

<sup>32</sup> 許邦和，《生活錄（一）》，1929年5月21日。

<sup>33</sup> 許邦和，《生活錄（一）》，1929年5月15日。

<sup>34</sup> 李海燕，《心靈革命：現代中國愛情的譜系（1900-1950）》，頁102。

她們去，充其量，使他們獲得我們同樣的意識，觀念形態，這是否值得做的事的確是問題。」<sup>35</sup>

在許邦和看來，中國女性的教育程度遠低於同時代發達的歐美社會，經「啓蒙」後覺醒的中國女性仍在少數。這點可從許邦和對趙四小姐的評價看出。趙與許為天津的同學，在信裡，許邦和稱其為「第一個讓他覺得女人可愛的人」。當得知趙香笙將「嫁給張學良作第五夫人」（其實並沒結婚，只是以祕書身分與張學良生活在一起）時，許邦和將之視為是「資產階級間」的、沒有個性與自覺的愛情：

這差不多是必然的事，在資產階級間，已經沒有個性的自覺與夫愛的存在了，在沒落傾向的集團中，張學良那落日一樣的威俊，豈不是很自然地在趙似〔四〕的女人們的眼中映成了異彩麼。哈哈，好玩的事。<sup>36</sup>對張學良和趙四小姐的愛情，許邦和這一旁觀者的批評並沒切中肯綮。

更重要的是，青年以「自由」和「解放」為號召的戀情往往非常不穩定。假期回到天津後，許邦和迅即戀上鄰居、商人家庭女子洪鳳祥。與謝寶瑾情況一樣，許邦和與洪主要通過信件溝通。兩人異地戀情並沒持久，很快即因洪與他人的訂婚而結束。得知洪鳳祥與洋行之子的婚事後，許邦和感到無名悲憤，並在日記中反省、痛斥社會。這樁戀情的失敗，在許邦和看來，一是因為洪母希望她嫁給有錢人，另一方面則是洪作為「資產階級子女」，缺少真正的主見和個性，隨勢左右。因此，自己的「啓蒙」和「教化」行動還未完全實施即遭遇挫折。「我夢想把她『拯救』出她那個打牌抽煙的家庭，同她過向陽的進步的自由的生活，然而還沒等到一半兒成功，已經被人下了毒手；作為一幕喜劇而閉幕了！」<sup>37</sup>

兩性關係中，雙方教育不對等帶來的文化資本和認識差別只是一個面向。雙方戀情成功與否、成功後成家立業的生計問題仍懸而未決。一方面，許邦和

<sup>35</sup> 許邦和，《生活錄（一）》，1929年5月15日。

<sup>36</sup> 許邦和，《生活錄（三）》，1929年10月20日。

<sup>37</sup> 許邦和，《生活錄（三）》，1930年2月28日。

自己尚在繼續學業，缺乏「能力」——養家的能力。「在毫無能力的我們，即便有決心，對於金錢婚姻，不也是往往那樣無奈地屈服嗎？『獲得能力』，是我底新口號，沒有實力，是不能，不配做美夢的。」<sup>38</sup>另一方面，家庭內部分工和社會習俗讓女性不得不更多地考慮生兒育女、困窘於家內勞動。第一段戀情中，已經工作的謝寶瑾現實地考慮雙方日後發展本屬平常。只是，身為學生的許邦和很難感同身受地思考這一問題之於雙方的重要性。對許而言，謝寶瑾和大眾所思考的工作「成就」和「社會評價」過於庸俗。對謝寶瑾回信中透露的日後生計和賺錢一事，許感慨，「我很恐怕同我和我朋友們以為的『成就』將系〔係〕兩致，假若這樣，我可以看見將來會有這樣一個幻滅，便是謝對我的失望，或者謝那社會的人們對我的失望！」<sup>39</sup>除了透露出對家庭和兩性關係的抗爭態度，許不想考慮「流俗的成功」，很明顯，他自己也並不清楚未來的方向。

更深層的問題，屬於這個時代和「社會」。許邦和認為資產階級的時代並沒有真正的個性和愛情，因為它讓金錢主導婚姻。「在這社會裡，一切都掛上了價目出賣，變作了商品！」<sup>40</sup>同屬進步青年、積極參與社會活動的北京學生郭根，也在日記中怒批資產階級社會是亂交的社會，其家庭內部、夫婦之間沒有真正的平等愛情。<sup>41</sup>兩段失敗的戀情，讓許邦和對趙四小姐選擇張學良的揶揄和痛斥進一步政治化。浪漫愛情的想像、感傷體驗以及對家庭的負面理解加劇了他對更純潔平等和親密關係的渴望，也讓許邦和更迫切地希望找到離開家庭後的出路，找尋新的價值認同。許邦和期待著能夠解答此一問題的新人生觀。

---

<sup>38</sup> 許邦和，《生活錄（三）》，1930年2月28日。

<sup>39</sup> 許邦和，《生活錄（一）》，1929年5月13日。

<sup>40</sup> 許邦和，《生活錄（四）》，1930年3月10日。

<sup>41</sup> 散木編，《郭根日記》（太原：三晉出版社，2013），頁292。

### 三、克服感傷：閱讀世界與政治思考的發端

對家庭束縛、戀愛關係中的煩悶和感傷體驗，許邦和並不將其視為個人的問題，而是視為時代和「社會問題」的一部分。這讓許邦和不斷尋找更大圖景的答案。事實上，這方面的求索本身既來源於他的閱讀史和時代氛圍，也反向刺激了他通過閱讀尋找更深層次的理論答案和人生動力。

上海這個東亞的文化傳播和經濟交流中心為許邦和的閱讀提供了便利條件，大商人家庭背景讓許在購書刊、報紙等方面並無太大困難。只要有了閒錢，或者親戚給許邦和郵寄生活費後，他很快會用這些錢逛遍上海書店。<sup>42</sup>五四新文化運動後，大量文化啓蒙的圖書和刊物出版，它們不僅在京津、上海這樣的政治、文化或經濟中心流傳，甚至眾多地方城市的學校圖書室也售賣這些書籍。1920-1930 年代，左翼作品和藝術更普及到眾多知識青年的閱讀世界中。<sup>43</sup>日記裡，許邦和詳盡地記錄了自己的閱讀內容。這些圖書中，對許邦和思想激化、強化其與現狀抗爭精神產生首要影響的便是各色新文學讀物。

1920 年代中後期，以光華書局、水沫書店為代表的出版各色新文藝書籍的「新書店」及其作品得到了許邦和之類激進青年和學生的熱捧。各色革命文學和左翼讀物在許的閱讀中佔比很大。許在日記中記錄了魯迅、馮雪峰等翻譯的幾乎全套《科學的藝術論》叢書。<sup>44</sup>不過，許邦和更看重激發青年抗爭精神的小說。他總結：「讀創作的小說，是觀察技巧之外，留意了內面存在的中國時代的變遷，及階級意識底變化的痕跡……給生活以關照的目的。」<sup>45</sup>許邦和

<sup>42</sup> 「從姨母家領到一些錢，便懷著去轉書局了，北新，光華，現代，開明，新約（別字），終於中華。」見許邦和，《生活錄（一）》，1929 年 4 月 26 日。

<sup>43</sup> 見唐小兵，〈民國時期中小知識青年的聚集與左翼化——以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為中心〉，《中共黨史研究》，2017 年第 11 期，頁 64-80；〈型塑社會想像的思想資源與概念工具——以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社會問題」系列圖書為中心的考察〉，《中共黨史研究》，2016 年第 5 期，頁 9-22。

<sup>44</sup> 參見馬鳴，〈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中國的早期譯介，1928-1930——以「科學的藝術論叢書」為中心〉（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頁 132-139。

<sup>45</sup> 許邦和，《生活錄（四）》，1930 年 4 月 20 日。

認為，能夠予生活和時代以關照，激發個人對現實之抗爭心、加強對社會苦難共情和同情心的就是好作品。而這些好作品，多是翻譯的革命小說，尤以蘇俄和日本的為主。

五四後，通過各色新文學，民國的知識界和革命青年普遍關注蘇俄。對俄國作品的喜好是許邦和受時代思潮，尤其是蘇俄影響的結果，它反向增強了許對蘇俄的嚮往。<sup>46</sup>「女布爾雪維克，俄國紅黨——聖馬麗亞，全是非常非常使人嚮往的。」<sup>47</sup>對青年學生而言，蘇俄大體上給予他們開創「新社會」或「新文明」的正面形象居多，連對政治總體不太上心的季羨林，也在閱讀近代著名報人胡愈之的《蘇俄印象記》後感歎「蘇俄真是天堂」。<sup>48</sup>實際上，這些小說中描繪的革命後俄國的貧弱現實和革命者的複雜命運，並沒有引起許邦和反感，反而增強了他那種近乎清教徒式或者王汎森所指出的「道德嚴格主義」式生活態度。

受益於南開時期打下的英文基礎，<sup>49</sup>許邦和得以閱讀眾多批判性小說、詩歌散文、戲劇等作品。許特別喜歡那些刻畫個人與家庭的矛盾、凸顯與時代和社會問題相抗爭的現實主義小說。這裡面既包括托爾斯泰的《復活》（*Resurrection*），陀思妥耶夫斯基（按：作者錯記為 Tunkneff）《罪與罰》（同學邢桐華譯本，<sup>50</sup>載於《南中生活》），愛倫堡的《煙袋》（曹靖華 1928 年譯本），高爾基的（*Lower Depth*）（按：《底層》），蒲寧的《張的夢》（按：韋叢蕪譯），契訶夫的《櫻桃園》、《萬尼亞舅舅》（*Uncle Vanya*），奧格約夫（N. Ogniov）的《新俄學生日記》（林語堂、張友松合譯），里別

<sup>46</sup> 參見羅志田，〈西方的分裂：國際風雲與五四前後中國思想的演變〉，收入氏著，《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與社會（修訂版）》（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頁 204-209。

<sup>47</sup> 許邦和，《生活錄（一）》，1929 年 4 月 24 日。

<sup>48</sup> 季羨林，《清華園日記》，頁 30。

<sup>49</sup> 南開中學的英語教學水準，可見於天津商人家庭子女葉篤莊的記述。見葉篤莊著，孟繁之整理，《一片冰心在玉壺：葉篤莊回憶錄》（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頁 85。

<sup>50</sup> 邢桐華是許邦和南開同學與摯友，後留學早稻田，精通英日俄文。在通信中多次與許邦和交流左翼讀物，提供左翼團體和左翼知識分子如郭沫若等的資訊。參見靳明全，《攻玉論——關於廿世紀初期中國文人赴日留學的研究》（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5），頁 104；林林，〈哀邢桐華〉，《新文學史料》，1980 年第 1 期，頁 103-104。

丁斯基（按：現多譯為李別金斯基）《一週間》。另一方面，由日本翻譯過來的不少無政府主義者作品，也為許邦和稱道。比如武者小路實篤《第二的母親》；有島武郎著、王靈芝譯的《與幼小者》；《洗衣老板與詩人》（楊騷譯）；《日本近代小品文選》（謝六逸譯）；平林タイ子的《在施療室》（沈瑞先譯）；《日本新寫實派代表傑作集》（陳勺水譯）。

許邦和渴求在閱讀中應對壓抑的時代和家庭氛圍，通過代入感克服煩悶、感傷情緒。由家庭和時代生出的傷感和頹廢，正如王瑤在分析郁達夫時所指出的，「是對現實不滿的悲憤激越情緒的一種摧抑，浪漫的情調中是有反抗和破壞心情的」。<sup>51</sup>青年時期加入中共的曾彥修直陳，各色左翼文學讀物是：

當時的一種風氣。很多反封建的尋找出路的青年人，感覺舊社會是腐朽的，毫無生氣，就像一具屍體，感覺到這個社會不行，必須要有所改變，一般便去追求新文學了。<sup>52</sup>

托爾斯泰的《復活》給予許邦和的情感幫助和精神激勵最大，以至於這書被他稱為「唯一的安慰」。<sup>53</sup>《復活》女主瑪絲洛娃面對人生的種種苦難卻能堅強應對的性格，讓許邦和無數次讚嘆並以此激勵自己，改正自己「軟弱」和「意志不堅定」的毛病。許不斷在類似讀物中尋找此種閱讀體驗。在閱讀另一無政府主義者武者小路實篤的《母與子》後，許邦和感慨：

它給了我很強很強的「要熱烈地生活下去」的力，那些故事，什麼都好；但是他所給與的生活的力，是誰也不能拒絕地給自己底良心加以煽動的吧！拿著死而後已的決心，揀死不了的道兒走！縱然跌倒了，無論幾次，都要爬起來的。有時不是無代價可以起得來的！<sup>54</sup>

軟弱、不善於與同學對質的許邦和需要不斷地通過這些作品來強化自己的性格和反抗意識，為自己受挫的情感找出路。

<sup>51</sup> 王瑤，〈郁達夫——「新文學史綱」之一節〉，收入王自立、陳子善編，《郁達夫研究資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下冊，頁 457-458。

<sup>52</sup> 曾彥修口述，李晉西整理，《曾彥修訪談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頁 20-21。

<sup>53</sup> 許邦和，《生活錄（二）》，1929年5月23日。

<sup>54</sup> 許邦和，《生活錄（三）》，1930年2月23日。

對許邦和影響最大的作者還是魯迅和郭沫若。許不僅在日記中多次記錄自己對魯迅的喜愛，更直接給魯迅寄信表達欽佩之情。信中，許邦和試圖從魯迅那裡獲得投身抗爭活動的認同。魯迅脫離語絲社到加入左聯，許認為這是魯迅走上革命之路的重要標誌，褒揚人生導師走向抗爭政治的選擇毋寧是對自己的激勵。<sup>55</sup>而郭沫若的浪漫詩歌因其情感、表達力和朗朗上口，其影響超越那些現實主義小說以及社會問題之類的理論書籍。曾彥修就指出，「革命的浪漫主義適合小青年，不管男女青年，都容易接受」。<sup>56</sup>郭沫若的自述也能激起青年人的奮鬥、反抗之情。「看郭沫若的〈我的幼年〉至深祖，對於他小時候那樣的大無畏精神（屢次被開），生了非常大的敬佩之感。」<sup>57</sup>後來負責中共宣傳與意識形態工作的鄧力群，特別強調五四後各色「新文學」作品對他自己一代革命青年的巨大影響。<sup>58</sup>

閱讀史提供了閱讀者想像未來社會的思想資源和概念工具。<sup>59</sup>而這些新文學作品中提供的新概念幫助他們形成了新的情感結構，提供了評判事物的不同標準。<sup>60</sup>當然，要指出的是，經由這些「新雜誌」和文學的閱讀和教誨，煩悶和感傷的消極情緒不一定都能解決，對不同青年也會有不同效果。瞿秋白回憶「新文學」閱讀對自己的影響時指出：「一九一八年開始看了許多新雜誌，思想上似乎有相當的進展，新的人生觀正在形成。可是，根據我的性格，所形成的與其說是革命思想，毋寧說是厭世主義的理智化。」<sup>61</sup>不同的作家和作品，

<sup>55</sup> 「魯迅脫離語絲社，是很重要的一個『奧伏赫變』」（按：Aufheben，德語揚棄之意），見許邦和，《生活錄（三）》，1930年2月4日以及3月8日晚的紀錄。

<sup>56</sup> 曾彥修口述，李晉西整理，《曾彥修訪談錄》，頁25。

<sup>57</sup> 許邦和，《生活錄（一）》，1929年4月14日。按：「祖」疑為別字。

<sup>58</sup> 鄧力群自述道，「在長沙，從1930年上半年開始，讀新文學。印象深的有三本：蔣光赤的小說《鴨綠江上》《少年漂泊者》和冰心的《寄小讀者》，很受感染。也讀了郭沫若的新詩集《星空》《橄欖》，印象深的是那些愛情詩，詩人同愛人一起數天上的星星」。見鄧力群，《鄧力群自述（1915-1974）》（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頁23。

<sup>59</sup> 王汎森，〈「思想資源」與「概念工具」——戊戌前後的幾種日本因素〉，《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上海：三聯書店，2018），頁203-216。

<sup>60</sup> 王汎森，〈五四運動與生活世界的變化〉，《思想是一種生活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頁104-106。

<sup>61</sup>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卷7，頁694。

給予許邦和之類激進青年提供了層次不同的情感體驗、社會現實感以及政治思考。閱讀讓許邦和誕生了模糊的社會階級意識，同時加深了對自己所處時代和社會困境的不滿。此一不滿讓許邦和不斷自我反省，批評自己「在舊的溫暖的興趣裡，還是也要摒當摒當，找尋一個機會，跳出 Romantic 幸福的生活，轉變向我們應當轉變的方向去呢」。<sup>62</sup>

自 1922 年入南開中學起，許邦和就積極地參與南開甚至天津的文藝活動和學生活動。雖然南開中學校風嚴格、功課壓力不小，但校園內學生自治社團和各種活動非常興盛。<sup>63</sup>民國初期，本著消費社和社員雙方合利共贏的理念，以及社會改造思潮中彌漫的互助合作精神，讓消費合作社這種自治社團在民國大學普及開來，進而也將互助、平等和合作觀念漸次傳播於大學校園。1924 年，南中興辦「南開學校消費合作社」，許邦和就是第一屆監察會成員。<sup>64</sup>不僅如此，許邦和也和現代中國話劇史上的大師曹禺（萬家寶）共事過。此外，許邦和所參與的《南中週刊》、《南中雙周》是南開中學的重要文學刊物，許邦和、其兄長許邦憲與曹禺同為南開文學會的重要成員。<sup>65</sup>

五卅、雙十或校慶周年紀念時，南開學校（1919 年之後包括南開大學）形成了舉辦專刊、演出話劇節目的活動。許邦和和其他《南中週刊》負責人曾專門組織「反日」的文藝活動。1927 年，南中學生會舉行第五屆代表大會，許邦和被選為「反日運動委員會」的十人委員之一。<sup>66</sup>「反帝愛國」的運動訓練、在南開的活動經驗和期間各色革命宣傳的薰陶，提供了許邦和充分的活動舞臺，調動了他參與政治社會活動的欲望和激情。正如呂芳上所指出的，五卅運動之後「學生運動的重心幾乎全移到學校以外，學校風潮大抵受校外政治社

<sup>62</sup> 許邦和，《生活錄（三）》，1929 年 12 月 10 日。

<sup>63</sup> 吳培培，〈南開的「變」和不「變」〉，收入王文俊等選編，《南開大學校史資料選（1919-1949）》（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9），頁 735。

<sup>64</sup> 參見 <http://www.yangmingauction.com/goodsdetail.html?auctionid=S15092&code=3551&page=26>（2022 年 6 月 29 日檢索）。

<sup>65</sup> 曹禺擔任總務股委員一職。見〈文學會首次大會記事〉，《南開週刊》，卷 1 號 8（1925 年 10 月），頁 87-88。

<sup>66</sup> 賈長華主編，《曹禺與天津》（天津：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頁 94。



會勢力的指導和推動，也就是說五卅以後的學運、學潮，明顯的變成了革命潮流的一部分」。<sup>67</sup>五卅期間，南開中學學生組織成立五卅後援會，由教務主任喻傳鑾組織，許邦和等青年學生不僅積極參與後援隊活動，還組團到滄州等地進行宣傳，向社會大眾普及五卅慘案經過以及處置滬案意見。<sup>68</sup>曾經與許邦和一同參加天津五卅運動的南開女中學生魏士如說道：「當時我們女學生聲援上海人民鬥爭的普遍行動是開展募捐活動……當時我是南開女中五卅運動後援會募捐股成員。男中的盧則民、許幫〔邦〕和也參加我們活動。」<sup>69</sup>

不過，大部分學校風潮都是倏起倏息，能夠與五卅這種全國性運動結合的仍是少數。實際上，短期參與政治後的失望和虛無很容易讓人從中退卻。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政治和社會現狀變動有限。革命青年被屠戮、共產革命陷入低谷以及壓抑的輿論環境讓激進青年的人生和政治選擇再次成爲問題。與許邦和大體同一時期的考古學家夏鼐，就在短暫的政治參與後選擇了回歸校園和專業精神。夏鼐在日記中提及，「翌年清黨事起，中國復亂，對國民黨感覺失望，始決定不談政治」。<sup>70</sup>

做出類似選擇的人並不在少數。曾經的新式青年許父認爲中國應該走人們各司其職的專業主義之路，至於政局，那是完全失去了是非和評判標準的地方。人只要進入政界，就會面臨被「腐化」和「墮落」的結局。在給許邦和的信中，許頌葵指出：

今日中國之最大不幸，即無真是非，報紙及輿論爾，從無真實記載，所謂人云亦云，一人唱之，百人私之；我攻爾醜，爾罵我貪。照第三者替他們分析，實半斤八兩，無分彼此。故最好各人盡各人之本責，

<sup>67</sup> 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頁3-4。

<sup>68</sup> 〈南開學生赴滄宣傳經過〉，《大公報》，1925年7月5日、6日，第2張第5版。

<sup>69</sup> 魏士如，〈參加國民會議運動及五卅運動的會議〉，收入中共天津市南開區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南中星火：南開黨史資料彙編（一）》（天津：中共天津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1991），頁136-137。

<sup>70</sup> 〈家世與少年時代〉，收入夏鼐，《夏鼐日記》（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卷1，頁8。

讀書者努力學問，辦教育者整頓校務，做商業者研究金融商務，推而至做官做政，各人各盡天職，各本天良。從此全國統一太平矣。<sup>71</sup>

民國政治變動不安以及家族事業傳承的需要，讓商人家庭大多不願子女從政從軍。許父也希望子女從事理工科和實業，有一技之長，便於安身立命。<sup>72</sup>許邦和選擇電機工程即是此種觀念的體現。

不過，許邦和認為，這種做好本職工作的事情於民國大局無補，學生應該跳出自己角色的限制，以行動參與政治和社會改造。對許父而言，這樣的選擇只會讓學生荒廢學業，最終一無所成，落得與民國「無聊政客」相同結局。許父認為：「學生既要努力學問，又要管外交，又要留心內政，則雖金剛百鍊之身，結束〔果〕荒廢學業，成了高等遊民，即今日所為最無聊的撥弄是非之政客是也。政客評人，頭頭是道，自己上臺，一樣貪斂毀法。試觀曹陸章在學生時代之著作演說，何嘗不是個愛國男兒，一至位高勢厚，就往黑暗的路上走了。因此予戒吾兒他日做實行家，始終保守爾貞潔，目前少發評人議論。」<sup>73</sup>民初國家崇拜和政治亂象引發政治疏離，許父既不認可梁漱溟之父梁濟選擇自殺這種極端消極的舉措，<sup>74</sup>也不認可陳獨秀等從文化和社會改造政治和國家社會的舉動，他看重本職工作為安身立命根基的價值。

許邦和的感傷還與時代的自殺風氣糾纏在一起。許日記中，多次提及「死亡」，更有過「自殺」念頭。<sup>75</sup>與許同齡的革命青年郭根、夏衍，甚至是對政治和革命不感興趣的季羨林，無一不在日記中透露過以自殺來解決日常生活和家庭中煩悶問題的可能。<sup>76</sup>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後新式青年因困惑、煩悶而自殺

<sup>71</sup> 許邦和，《生活錄（一）》，1929年6月10日。

<sup>72</sup> 見葉篤莊著，孟繁之整理，《一片冰心在玉壺：葉篤莊回憶錄》，頁125。

<sup>73</sup> 許邦和，《生活錄（一）》，1929年6月10日。

<sup>74</sup> 關於梁濟的自殺，參見羅志田，〈對共和體制的失望：梁濟之死〉，《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5期，頁1-10。

<sup>75</sup> 許邦和，《生活錄（二）》，1929年5月23日，1929年7月21日。

<sup>76</sup> 夏衍在日記中說道，「如我一死或可將許多問題解決！……自殺，超越大欲的自殺，非大勇而何？」收入沈寧、沈旦華編，《歲月如水流去：夏衍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6），頁49-50；郭根，《郭根日記》，頁241；季羨林，《清華園日記》，頁129、132。

的現象，陳獨秀指出的克服路徑——解除消極思想的暗示（改造人生觀）——正是許邦和情感上所經歷的過程。<sup>77</sup>許邦和把死亡與對日常生活和社會現狀的否定態度聯繫起來，並指出，只有抗爭、動起來的生活才是值得追求的。他說：「聽到這樣以否定為更強的力的論調，是多麼該警惕地躍起的呀。我前數月認為人生的目的就是『死』的想法，在這裡找到了更強的根據，否定的力才是強於一切的！」<sup>78</sup>通過《壁下譯叢》中的文章〈否定的文學〉，許邦和確認了自己的想法。人生不能是坐而待斃的，需要抗爭、否定的精神。因為：

否定之力的發現，是生命正在動彈的證據，否定真會生發那緊要的東西，否定真會養成那緊要的東西。由否定表現自己，由否定而心泉流動，由否定而自己看出活路……踏爛在彼得大帝的銅像之下的平凡人的反抗，要在地上，實現那天馬行空之概的傲者的破壞，誰能說不是二十世紀的革命呢？要由死 VS 得生的否定之力，是革命。<sup>79</sup>

「動」起來的抗爭和行動，或許能擺脫感傷厭世甚至自殺的想法。

新文學的閱讀強化了許邦和通過求「動」的人生觀，追尋政治和社會改造的抗爭行動以擺脫自殺念頭，為新的情感表達找尋出路。許沒有像夏鼐一樣，在短期失敗的政治參與體驗之後，就拋卻政治和社會改造的奮進之路。進化論瀰漫的社會思潮下，「青年崇拜」和「青年優勝」觀念在革命思潮和文學裡尤為盛行。<sup>80</sup>許認為，青年最重要的本錢是時間，因此，短暫失敗並無所謂。而且，「倘從人生全體來想，則失敗最多的是青年時代。對於這失敗和破壞，我們是萬不可畏懼的。惟這青年時代，雖有許多失敗和破壞，而在尋求真理這一點，卻最為熱心」。<sup>81</sup>只是，這一反抗意識到底會導向何方？個體的反抗如何

<sup>77</sup> 陳獨秀，〈自殺論——思想變動與青年自殺〉，《新青年》，卷7號2（1920年1月1日），頁1-13。

<sup>78</sup> 許邦和，《生活錄（一）》，1929年5月11日。

<sup>79</sup> 許邦和，《生活錄（一）》，1929年5月11日。

<sup>80</sup> 五四後「青年優勝」在革命文學的表現，可見姚玳玫，〈「青年」與1928年的革命文學運動〉，《中國文學學報》，期4（2013年12月），頁109-132。

<sup>81</sup> 許邦和，《生活錄（一）》，1929年5月11日。

才能與社會的變動結合起來？是否需要加入特定的組織或者運動？這些是許邦和繼續思索的問題。

#### 四、從感傷到懺悔：抗爭政治中的自我反省

許邦和試圖通過戀愛和閱讀來克服煩悶和感傷心境，但戀愛反而加劇了他的傷感，閱讀則激勵了他的抗爭意志和通過其他方式尋求新的情感表達空間和親密關係。掀起更大範圍的抗爭行動需要更多志同道合的「同志」一起進行社會改造。「同志」如何找尋？顯然，他只能先從自己的人際社會網絡中去尋找與自己具有相似情感狀態和抗爭意志的人。但是，無論是家庭，還是在學校的學習、社團生活以及參與的社會活動，許邦和持續遭遇挫折。這一挫折感，加劇了許邦和的抗爭信念，同時也悖謬地強化了他在反省時對自己「資產階級」出身的「原罪性」懺悔意識。

受五四新文化運動和五卅運動等洗禮之後的許邦和，尋找的是一條更加激進的改造「傳統」和「社會」之路。對父親依靠實業、做好本職工作救國的想法，許邦和不以為然。他認為這「正是幾千年來做皇帝下順民的政治思想」。<sup>82</sup>無論是父親「曹陸章」的舉例還是他對「家庭」、「貞潔」問題的意見，許邦和認為它們都只是「順腦滑」的平穩保守之見。其實，像許父對政治參與失望進而走向實業路線或者走專業主義之路的人，並不少見。只是，這穩健的生活之路，與個人發展和時代大勢不相符合。許邦和認為自己與父親的差異，完全源於不同的時代精神。只有大步向前，確定加入他從革命文學讀物中所獲知的這個「Pro 文化運動」，才是符合時代要求的選擇。家境優越的許為何會與這個「無產階級」的運動關聯起來？

許邦和曾經把母親視為他的「同道中人」，許會與母親探討時政，討論馮玉祥的命運。與許邦和的通信中，許母曾憤恨時代對自己的迫害，痛恨無法從

---

<sup>82</sup> 許邦和，《生活錄（二）》，1929年6月10日。

事自己感興趣的志業。「我現在覺悟了！我是父親豢養的一只鳥（比鳥不甚確切，因為這只鳥是他不愛的），一切多得聽他支配」，「我的痛苦，我的悲傷，子女中能夠深切諒解者，能有幾人？……我是一個時代的（白）犧牲者啊！」<sup>83</sup>許邦和本以為自己非常理解許母對家庭的評價。為幫助其母擺脫這種壓抑情緒，許邦和準備好了閱讀建議，甚至試圖號召兄弟姐妹在日常衣食上降低要求，減輕母親工作壓力以緩解焦慮和苦悶。誰知這一過程中許卻遭遇了母親的不理解，她還站在許父一邊，勸誡許邦和父子關係和家庭親情的重要。這讓許邦和感到莫大的挫折和傷感，「被（母親）這樣誤解，也好。家庭，什麼家庭！怪魔窟而已」。<sup>84</sup>

另一方面，許邦和認為自家的家族生意直接受惠於近代「帝國主義」，這讓他產生了因家庭出身帶來的「原罪」意識。買辦商人出身的大家庭限制家庭內的自主和平等氛圍，家裡缺乏對子女的想法、意見和個性的尊重，而這也造成子女們的「軟弱性格」。許如此反省，「自己覺得血裡仍流著怯弱的毒素，見懼於哥哥的威嚴，媽媽的威嚴之處，這是傳統的奴性，非盡力克服不可」。<sup>85</sup>這一「奴性」，許邦和認定，正是資產階級及其「文明規範」對個體規訓的結果。對這「壓迫」和帶有「罪惡」的家庭，他要逃離。

平常與人爭論的時候，身為演講隊一員的許邦和總是無法發揮出自己的專長，正面與人交鋒，許多次慨歎自己的軟弱。<sup>86</sup>瞭解了心目中那些敢於反抗的英雄人物之後，許懺悔意識更深：

---

<sup>83</sup> 許邦和，《生活錄（一）》，1929年6月25日。

<sup>84</sup> 許邦和，《生活錄（二）》，1929年7月19日。

<sup>85</sup> 許邦和，《生活錄（四）》，1930年3月10日。

<sup>86</sup> 許邦和，《生活錄（一）》，1929年3月19日。

看郭沫若的〈我的幼年〉至深袒，對於他小時候那樣的大無畏精神（屢次被開），生了非常大的敬佩之感，而想到自己從小就那樣懦弱，有反抗的心而極少反抗的表現，「家教」於是看出它的作用來：只是使孩子成一個穩健者流，終於是一個弱者而已。<sup>87</sup>

早在 1925 年 12 月 1 日〈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毛澤東就運用馬列主義的階級方法分析中國問題，但中共開始反省和批判小資產階級的「原罪」卻是要到 1920 年代末。<sup>88</sup>面對革命的挫折，左翼文人反省「小資產階級意識」（多指知識分子）有了更多的反響。以後期創造社和太陽社為代表的「革命文學」反思「小資產階級」的原罪。許邦和對資產階級各方面軟弱性的分析和反省，多受到左翼文人的討論影響。<sup>89</sup>知識分子或「小資產階級」個人性格的軟弱和耽於享樂，很難說是階級的特殊屬性，只是許邦和受革命文學閱讀和左翼思潮，尤其魯迅對「小資產階級」批判的影響，深處此話語之中而不自知。

當許父來上海看望許邦和，帶他體驗大上海繁華後，許邦和如此反省：

與父親奢侈的一天，最奢侈的 Astn House 吃中飯，做 84 號汽車（那是上海出名的一輛，因為復旦女皇常坐的。）我是揩親戚的油。整個的身心浸沾於資產者的毒湯中，回來要好好寫一篇懺悔的日記。<sup>90</sup>

許邦和意識到自身的「原罪」，卻無法擺脫，甚至經常會沉溺於這樣的享受。此外，因戀上城市「資產階級子女」而難以自拔，許個人的道德負罪心理更加鬱積難解。「自己是愛著一名美麗的，年輕的，幼稚心靈的，然而『都市裡』的姑娘了！我患了戀愛病了，在這悠悠的秋天！」<sup>91</sup>時刻懺悔卻仍無法拒絕資產階級的享樂，這正是馮雪峰及魯迅所透露出的，「知識分子」或「革命的知

<sup>87</sup> 許邦和，《生活錄（一）》，1929 年 4 月 14 日。

<sup>88</sup> 參見張廣海，〈小資產階級原罪意識的誕生、規訓與救贖——論大革命後左翼知識分子自我認知機制的轉型〉，《文藝理論研究》，2012 年第 4 期，頁 29-35，轉頁 76。

<sup>89</sup> 本文所涉及的「小資產階級」主要是指擁有一定文化資本的知識分子，尤其是城市中的青年學生。關於「小資產階級」如何與「知識分子」大體劃上等號，可參見鄭堅，〈五四以來中國文學中的小資產階級形象溯源〉（上海：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4 年 6 月），頁 16-23。

<sup>90</sup> 許邦和，《生活錄（一）》，1929 年 4 月 18 日。

<sup>91</sup> 許邦和，《生活錄（三）》，1929 年 9 月 29 日。

識階級」的一個重要缺點——缺乏堅強行動、徹底參與革命到底的行動精神。<sup>92</sup> 因為買辦脫離了「大眾」，許邦和家族的優越生活在近代中國社會的「黑暗現實」前更顯罪惡，他尋找背棄自己出身的革命行動的道德邏輯強化。在與兄弟的交流中，許透露出：「做正義的事，雖然爸爸反對，實在是對爸爸有利的，個人主義地說起來。我們至少可以替爸爸贖了他對社會犯上的罪，欠上的債。這樣看，雖然感情上是給了他創傷，我們的良心上不必因為感到痛苦而躊躇的。」<sup>93</sup>「革命」、「正義」和「未來」，作為終極目的，在許邦和那，可以把「花錢」工具化。

1929 年底，通過與家裡的通信，許邦和得知父親生意走下坡路，自己在交大的生活費用都必須要開始節省的時候，不得不在日記中哀歎：「『中人之家』要沒落了，沒落了，我們呢，我們轉向 Pro 層！自然底的傾向加上了社會底的必然性，要判決媽媽，同我們的命運！」<sup>94</sup>許在交大參加的各種運動俱樂部、社團以及和友朋通信都是很大的開銷，以至於許父在通信中，勸告許邦和儘量少參加無益的社團和俱樂部，以降低開銷。經濟地位的滑落讓許邦和因審美和閱讀品味產生的邊緣意識加劇，他在交大學習生活中感到的「被孤立」和少數人的焦慮心態更甚。

因父親生意沒落，許邦和要跌入「無產階級」（按：許常用「無產者」，或者英文的「Pro 層」）的焦慮被轉化為強調自己對此一人群的積極認同。學校環境的影響與閱讀視野，讓許邦和的抗爭意識深化到身體的內在感知，並開始有意識地表述其政治態度。許邦和認為，他與交大的那些同學，尤其是天天穿大衣、西服的人已經不屬於同一群體。為此，許特意在日常生活中穿學生制服，以凸顯自己更底層的身分和政治認同。許父曾給其 300 元專門訂製西服，卻被許邦和拒絕了。「經了幾度的思考，我捨棄了這恩惠。與其打扮成一個『鮮

<sup>92</sup> 畫室（馮雪峰），〈革命與智識階級〉，《無軌列車》，1928 年第 2 期，頁 43-51；魯迅，〈關於知識階級〉，《魯迅全集》，卷 8，頁 223-231。

<sup>93</sup> 許邦和，《生活錄（二）》，1929 年 7 月 7 日。

<sup>94</sup> 許邦和，《生活錄（三）》，1929 年 12 月 10 日。

衣怒馬』的紈袴公子的樣子，我是毋寧穿上本分的制服，以精神的強悍給我周圍的『傲者』們。」<sup>95</sup>許邦和自己的家庭和教育背景並不屬於無產者或工人階級，他對無產者的這種政治認同更多是主體的自我選擇。但這種認同如何與更大範圍的現實和人群結合起來呢？

1929 年至 1930 年代初，城市中的中共組織遭遇多次破壞，革命陷入低潮，組織性的群眾運動大多偃旗息鼓。許邦和所面對的「大眾」不僅無聲，且對中共革命並無太多瞭解與同情。電影院觀賞俄國革命的影片時，對身邊那些觀眾漠視俄國民眾的偉大鬥爭精神，他毫不掩飾自己的不滿。「眼前俄國民眾暴動的情形突然消滅而映著的是那些啡色的衣履，紅唇，媚笑，大腹賈，油面少年等，才覺到深深的厭惡，這些人簡直是來『欣賞』來了。」<sup>96</sup>其實，當時影院的觀眾，大多不是許邦和想像中的底層勞工或者「無產階級」。無論是電影、藝術、小說還是理論書籍，許邦和認為，它們都是更廣闊的社會現實的象徵，他理解不了、也無法接受「大眾」對藝術作品所映射「革命現實」的漠視。在許邦和眼裡，身邊的交大學生也多沉醉於資產階級式的審美情趣和享樂主義文化。交大話劇社本想請許邦和出演田漢《名優之死》改編版，因仰慕田漢已久，許最初接受了出演，當發現改編結果自己並不滿意後憤怒拒絕，並怒批：

考該劇以享樂主義沾沾自得，既無劇情，又缺高義，僅是一個男人……縱欲的狹義的青春享樂主義而已。女的毫無個性，男云什麼，她信什麼……下午毅然辭了的……心目中既是有了高尚的藝術的地位，就容不得同那些「文明戲」子混在一起，沾些低級的趣味。中國大學生的興趣還是太低，太低，簡直看不上，尤其南洋這幫。<sup>97</sup>

許邦和認為，這些人的審美脫離了社會現實和「大眾」的需求。

除了文字和偶爾對學校管理層的些許抗議，作為學生，許邦和認為自己在校園能做的非常有限。用文字表達的抗爭之心，相比革命所面臨的「血淋淋的

<sup>95</sup> 許邦和，《生活錄（一）》，1929 年 5 月 13 日。

<sup>96</sup> 許邦和，《生活錄（二）》，1929 年 6 月 9 日。

<sup>97</sup> 許邦和，《生活錄（一）》，1929 年 3 月 20 日。



事實」，微不足道。「『五卅』，『慘』，『血』，那些比起事實來是滑稽地弱小的字眼。」<sup>98</sup>當在《民國日報》上讀到，南開的學弟郭中鑒（曹禺同班同學）被當做「共黨特務隊員」處決之後，回想在南開時盲目地與學弟為難，許邦和傷感而憤懣，對自己軟弱性格表示「無限懺悔」！「回看我們自己委頓在灰的壁壘裡，雖然不時昂頭探望一下，然而究竟有了什麼長進呢？我要在這裡，深深地為郭中鑒及他的同伴們祝福！為正義為人道而叛逆者，我給與永遠的尊敬。」<sup>99</sup>

一方面，許邦和痛恨著小資產階級軟弱性；另一方面，他試圖繼承自己在閱讀魯迅作品中所把握的俄國知識階級特性——「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苦痛告訴大眾」式的革命啓蒙精神。<sup>100</sup>為 1930 年五卅運動印刷紀念小冊子時，許近距離觀察印刷廠的工作：

排版的工人工作了十數小時……那樣吃苦忍受的偉大是又使人受感動的。骯髒的貧民窟的馬路，一切是灰色……然而工人們間是有可尊敬的兄弟愛的，他們一日耐勞收關，互相幫助，尤可欽佩的是幾個陪著努力了一夜的童工，有幾個童工夜間睡了，一早起卻便來幫忙。<sup>101</sup>

同情底層和民眾的民粹情感，多源於晚清以來革命的，尤其是無政府主義和各色社會主義思潮及文學作品。它表現為把沒有知識文化的底層勞動者（不僅僅是農民）無條件神聖化，認為只有他們才擁有純潔靈魂、高尚道德和善良品質。五四時期的「勞工神聖」、平民主義理念波及到社會文化生活的各個領域，早期中共領袖和左翼人物多有此一傾向。<sup>102</sup>日記中，許邦和多次流露出對農村生活和底層勞工人同情而艷羨的一面。當夜晚去公園時，「看到中國小孩的活潑，並不比外國小孩不活潑。可憐他們是受著階級底壓迫，只有晚上的公園才是他

<sup>98</sup> 許邦和，《生活錄（二）》，1929年5月30日。

<sup>99</sup> 許邦和，《生活錄（二）》，1929年6月20日。

<sup>100</sup> 魯迅，〈關於知識階級〉，頁224。

<sup>101</sup> 許邦和，《生活錄（二）》，1929年5月30日。

<sup>102</sup> 比如中共創黨領袖李大釗，參見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著，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譯組譯，《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頁77-98。

們的世界」。<sup>103</sup>雖然工人和童工工作環境差，但是他們的工作態度和精神都讓許邦和感到慚愧。這一羞愧既有身為知識階級而讓體力勞動者服務於自己的懺悔面相，也有他對工人和童工的民粹式道德同情和模糊的政治認同。

但工人、底層民眾和許邦和等學生之間的距離和差異巨大。中共早期勞工運動負責人羅章龍指出，學生們接觸工人過程發現，工人們對學生抱著一絲警惕和若即若離的態度，青年知識分子也感覺到雙方之間的疏離，他們意識到自己與現實民眾的隔膜。<sup>104</sup>許邦和難免此一悖謬現實。公園中，看到他穿著學生制服，童工和窮苦人家的小孩只敢在遠處坐著觀望；去市區印刷店，打印工人不會跟他搭話，只有小報的編者要和他們這些穿著學生服的搭話，顯示自己的「文化資本」和品味。<sup>105</sup>一面是知識分子對平民的崇拜和信仰，對「庶民」道德優越性的肯認；另一面是民眾的「昏睡」和革命者的失望。民眾不僅拒絕了啓蒙的聲音，同時也似乎以自己的「愚昧」「冷漠」「偏狹」擊碎了知識分子心中一廂情願的「民粹」幻影。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文中，毛澤東曾指出：「我是個學校裡學生子出身的人，在學校養成了一種學生習慣，……那時我覺得世界上乾淨的人只有知識分子……革命了，同工農兵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這時，只是在這時，我才根本地變化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的與小資產階級的感情。」<sup>106</sup>這一權威表述，更是對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之間巨大區隔的再論證。知識分子需要在革命和鬥爭中接受「再教育」，才能與他們平時在道德上表示同情和憐憫的對象真正聯合，並站在工人農民的立場上。這正是日後知識青年進入革命組織之後自我改造的重要原因。

<sup>103</sup> 許邦和，《生活錄（一）》，1929年5月3日。

<sup>104</sup> 羅章龍，《椿園載記》（北京：東方出版社，1989），頁106。

<sup>105</sup> 面對小報編者這種人，許邦和充滿鄙夷，他認為這種人只會「吹牛，胡說八道，然而連常識都沒有……要裝得正經，談出不通的話來」。見許邦和，《生活錄（二）》，1929年5月30日。

<sup>106</sup>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解放日報》，1943年10月19日，第1版。

毛的講話還提示出另一重要問題，知識分子單靠自我反思和懺悔是無法真正擺脫個人的苦悶與感傷，完全進入革命運動之中的。許邦和也認識到了這一點。個人反省和朋友勸勉仍然不足以完成「革命的再教育」，甚至無法堅定他加入革命的決心和意志。理論閱讀和組織訓練，非常必要。許邦和想像中的無產階級文化、政治運動能帶給他何種政治、人生意義的慰藉，這一運動與他覺醒後的主體意識、抗爭政治是何種關係，有無矛盾之處，許邦和的理論閱讀、人際交往和社會鬥爭中需要進一步解答。

## 五、感傷的超克：革命救贖

城市流動的社會生活和紛雜的新文學閱讀讓青年學生持續追尋人生問題答案，追求新的希望以擺脫感傷。季羨林就指出，「希望，無論將來能否如願，總能給人生氣，叫人還能活下去」。<sup>107</sup>許邦和更強烈地感受到此一需要。他同時從兩個方面去尋找克服感傷情緒和「原罪」意識的方法：閱讀世界中對革命者的角色體驗和尋找革命同道、加入組織——情感的避難所。

閱讀俄羅斯紀實文學家伊利亞·愛倫堡（Ilya Ehrenburg, 1891-1967）《煙袋》一書，再現了許邦和的審美情趣，以及他如何經由類似作品找到克服感傷情緒的路徑。許不僅可以「全天浸身於《煙袋》的閱讀之中」，還無數次由衷地讚賞小說中描寫的革命英雄。「俄革命後，街頭裡下那些流浪的小英雄們，是如何地顯示著我們鄰人斯拉夫民族的偉大呀。卓絕的堅忍，耐苦的靈魂是純粹無產者們的寶藏的所在！」<sup>108</sup>英雄主義與浪漫的俄國想像結合，蓋過了作品中凸顯的革命後蘇俄落後的社會經濟現實。「物資貧乏」而革命意志昂揚、生活不缺乏目標，對許邦和來說，這樣的社會更具有吸引力。其在日本的高中好友更來信勸勉，「希望我像俄國大學生似的，將來做那樣的事。要在小說裡做

<sup>107</sup> 季羨林，《清華園日記》，頁171。

<sup>108</sup> 許邦和，《生活錄（一）》，1929年4月24日。

個主角，至少應該有那樣的精神，新的，強的，勇的形態」。<sup>109</sup>這種要做主角的心態，讓許邦和尋求著與更大「運動」的合流。日記中，許邦和評論了日本的俄國文學研究者片上伸（1884-1928）的演講。片上伸以易卜生和托爾斯泰為核心，將北歐文學核心概括為「富含著極端的徹底的態度而抱著不做不徹底的中途妥協的思想」，許邦和對這點印象最深：

「北歐文學的原理」……要而言之，並非在伊索生和 Tolstoy 的極端和空想之處，是有價值；價值之所在，是在即使因此做了許多的破壞，招了許多的失敗，也全不管，為尋求真理計，就一往而直前。<sup>110</sup>

這「否定性的生活」否定的是什麼呢？真理呢？

1920 年代末期，民國政治的混亂仍然沒有終結，軍閥紛爭，國民黨內部派系鬥爭頻繁，而「清共」造成的肅殺之氣和壓抑的政治氛圍仍然瀰漫。許邦和極度不滿，卻又對這一現實無能為力。面對這一時代氛圍，許哀歎從前的示威遊行「終於漸漸衰落」，「狂喊者變為沈〔沉〕默者，熱血者成的〔為〕識時機的『讀書來救國吧』的信徒」。許邦和指出，有兩種人不許「我們喊：『奮起瘦臂，向敵人進攻』」，「一種是溫和的臉，勸告的態度，對你說，不許喊，喊了不利；一種則老實不客氣，揪住你的嘴，一刀」，因此「我們只能悶在小小的屋子裡，流一些滑稽的涕」。<sup>111</sup>

情感上無法應對黑暗沒有消散的現實，對時代的憤恨更深。許邦和更嚴厲抨擊國民政府治理下在校園逐漸展開的三民主義黨化教育。當妹妹許邦華來信告訴他，自己在南開的「中學組黨義演說會」以「如何實現民生主義」獲第一名時，許邦和不忘揶揄這題目的陳腐，只鼓勵她做一個「舌的戰士」。定都南京的國民政府甚至成了租界巡捕房這種「帝國主義勢力」的同路人。「聽帝國

<sup>109</sup> 許邦和，《生活錄（一）》，1929年3月28日。

<sup>110</sup> 許邦和，《生活錄（一）》，1929年5月11日。

<sup>111</sup> 許邦和，〈五卅，我們被屠殺的日子〉，《民廿一級五卅紀念特刊——交通大學日刊臨時附刊》，1929年，頁2。

主義者的指揮的已經不僅是『老閘捕房』了，而還有他們、『他們』呵！」<sup>112</sup>對來交大開會的「市黨部代表」，許邦和如此描述：「但是他穿的是洋裝，大衣，漆皮鞋，眼鏡，白羊毛圍巾，並且坐著汽車來的，來指導，只是說了一兩句浮皮的話，抽去三根白金龍而已。」<sup>113</sup>這樣的國民黨黨代表，讓許邦和很難對國民黨從內部做自我改造抱有信心。<sup>114</sup>對好朋友加入國民黨一事，許邦和難以理解。他甚至因此去信質問對方，好友不得不做辯解，「聲明他絕不會是去拍馬鑽營的」。只是，許邦和仍將這一行為視為是意志薄弱、生活中缺乏抗爭精神的體現。<sup>115</sup>曾經的革命政黨國民黨已經墮落了，那麼出路何在呢？

對交大大部分學生的抗爭精神和審美趣味，許邦和沒有太高評價。「在交大，鬥爭的事簡直沒有發生的可能，那一張張臉，不是滿浸著 america sport 味兒的黃光氣，便是忠厚的死寂的民族象徵的絕無表情，況且，當局又有政治勢力！」<sup>116</sup>許認為，他們同當時的社會一樣，儼然失卻了「生」的熱誠和動力。瑣碎的日常生活和貧乏的精神，許邦和報之以不屑一顧的態度：

交大畢業，可以被派到什麼鐵路上去工作呢？膠濟路最舒服！日本回來又怎樣……帝大畢業有作巡警的！……我們要生活，不，「生活」還嫌太高，我們需要的是「糊口」，「糊口」。<sup>117</sup>

名校出生的優越感並不能逃脫日常生活和世俗欲望的支配，這正是許邦和擔憂的。「自己覺得近來有被資產者的生活的典型轉移的危險，老想起畢業怎樣找一個職業，『舒服的』觀念對我似乎有了迷醉，而且最近竟要求寒假回家。」<sup>118</sup>

<sup>112</sup> 許邦和，〈五卅，我們被屠殺的日子〉，《民廿一級五卅紀念特刊——交通大學日刊臨時附刊》，頁 2。

<sup>113</sup> 許邦和，《生活錄（一）》，1929 年 3 月 20 日。

<sup>114</sup> 李志毓從國民黨改組派的分析中，指出部分革命青年在國民黨內部和三民主義旗幟下革新的可能性，參見〈大革命失敗後國民黨左派青年的困頓與探求（1927-1932）〉，《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 年第 6 期，頁 60-69。

<sup>115</sup> 許邦和，《生活錄（二）》，1929 年 7 月 7 日。

<sup>116</sup> 許邦和，《生活錄（三）》，1929 年 12 月 4 日。

<sup>117</sup> 許邦和，《生活錄（三）》，1929 年 9 月 20 日。

<sup>118</sup> 許邦和，《生活錄（三）》，1929 年 10 月 21 日。

舒適生活的目標既無法解決許邦和的焦慮，無法讓他擺脫「資產階級」出身的原罪意識，更不是他作為一個想加入抗爭政治的行動者應該追求的信念。

在交大，許邦和參與了驅逐交大祕書長、副校長陳孝剛的風潮。<sup>119</sup>這一風潮並無大的反抗對象，純粹是交大部分學生為了避免考試以及對學校領導之日常管理風氣的不滿所致。許邦和卻試圖賦予運動更大的意義：對腐化官僚的抗爭。結果成功與否，無關輕重。風潮中，許被列為「交大發展委員會」委員之一。對此，許邦和很清楚委員只是被拉出來負責與學校管理者去鬧的「代表」而已，其他學生可以「站在後面完全變成第三者，充其量感情激越時給一些呼號的援助」。<sup>120</sup>風潮最終以新任校長孫科的到校訓話結束。<sup>121</sup>許本來期望在這一風潮中找尋抗爭現實的同道，可惜的是，他再次限於「少數人的地位」。「當學生，鬧風潮，驅逐的又是腐化得一塌糊塗的臭官僚，是無容猶疑的。考，也許吃虧受影響；假若被革除，認為搗亂分子，我便離開學校，離開爭鬥，回天津去，向家裡要求去日本。反正這是沒有什麼可怕的事。」<sup>122</sup>這種與現實尋求對抗、批判體制和主導性權力政治與文化的一面，正是左翼批判視野內蘊要求。許邦和知道，他能鬧的一個前提正在於自己相對還算殷實的家境。但交大同學大部分缺乏抗爭和對社會現實的同情心，以及追尋「真理」的信念。自己的這一抗爭如何與革命運動及未來社會結合？

抗爭的方向來源於閱讀。對時代壓抑氣氛的不滿，讓許邦和急於獲得對社會和歷史發展的主動理解以及方向感。1930年初的寒假，許沒有選擇回家過春節。各色馬克思主義和社會問題的讀物在許邦和的閱讀和日記比重中開始大幅增加，他關注作為「真理的主義」，它可以提供歷史的方向感，並取代死亡或者棄世等或悲觀或被動的選擇。王汎森曾精當地指出，近代中國以來，範例

<sup>119</sup> 〈國民政府鐵道部任命黎照寰為副校長的訓令（國民政府鐵道部訓令字第一〇五三號）〉，收入《交通大學校史》撰寫組編，《交通大學校史資料選編（1927-1949）》（西安：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1986），卷2，頁3-4。

<sup>120</sup> 許邦和，《生活錄（二）》，1929年6月14日。

<sup>121</sup> 許邦和，《生活錄（二）》，1929年6月20日。

<sup>122</sup> 許邦和，《生活錄（二）》，1929年6月14日。

式史學不再吃香，新的史學普遍帶有尋找並建立規律、公例、律則的特色。<sup>123</sup>這種從歷史中尋找規律的時代思潮正是「轉型時代」後期激進心態的反映，也是現代性時間意識中突出未來，並通過規律的掌握實現人對社會和歷史自我立法之「人的神話」的體現。<sup>124</sup>

無產階級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對許邦和來說意味著什麼呢？「讀理論書為得是確定信仰，抓住真理，備作他日，甚至一生活動底基礎的勇氣及堅決的源泉。」<sup>125</sup>理論能提供答案。這方面的書籍，主要就是各色各樣的馬克思主義相關的社會科學書目，它們在當時上海的左傾學生、革命青年中非常流行。羅家倫曾在日記中記載此事，「現在上海新書店林立，譯出關於社會科學書籍，多係唯物史觀一套，以投青年之所好，亦足以規青年思想之趨向」。<sup>126</sup>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指出，1920年代末社會學和社會科學的閱讀熱潮是對中國革命態勢的重要反應。<sup>127</sup>對許邦和之類的年輕學生而言，社會科學，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相關社會科學書籍的流行是他們在革命陷入低谷之後，用以克服人生觀和尋找社會問題出路的體現。

馬克思主義歷史哲學要提供的，首先就是資本主義社會消亡的必然性。「資本主義已經到了最後掙扎的慘澹的局面了。高的壁壘終於要巍然頹墜下來的，我們要預備歡迎人類新世紀的到來。」<sup>128</sup>這個「新世紀」以及沒有資本主義的未來社會構成了許邦和認為的奮鬥目標。為上海本地雜誌《小朋友》寫作的童話故事中，<sup>129</sup>許邦和以兩兄弟鞋匠史可和史配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和結局，直白

<sup>123</sup>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中的「未來」〉，《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頁 284。

<sup>124</sup> Reinhart Koselleck, *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 pp. 192-204；以及張灝，〈中國近百年來的革命思想道路〉，收入《張灝自選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頁 292-307。

<sup>125</sup> 許邦和，《生活錄（四）》，1930年4月20日。

<sup>126</sup> 羅久芳、羅久蓉編輯校註，《羅家倫先生文存補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頁 436。

<sup>127</sup> 阿里夫·德里克著，翁賀凱譯，《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起源，1919-1937》（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8），頁 36-39。

<sup>128</sup> 許邦和，《生活錄（一）》，1929年5月5日。

<sup>129</sup> 1922年4月創刊於上海，屬於青少年讀物，週刊。該刊由小朋友編輯部編輯兼發行，主要負責人有黎錦暉、陳伯吹、潘漢年等。

地表露了他認為金錢無法與快樂和繁榮掛鉤，以及追求「快樂生活」的烏托邦想法。<sup>130</sup>許曾以此目標來勸說他通信的女朋友放棄自己的宗教信仰，因為這一目標能夠提供與宗教相似的生活動力。「然而現在，給我們同樣的甚至於更甚的『生的熱誠』與『生的鼓勵』的東西已經有了，他給我們一個目的，是一個有實現性的目的……我們有了這個，我們為什麼不拋棄宗教呢？」<sup>131</sup>許邦和希冀以「歷史的判決」代替「上帝的審判」，而為了避免被認定「有罪」，青年人必須努力奮鬥。

這一「新世紀」的到來，需要經歷苦痛與鬥爭，資產階級的時代並不會自動退去。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通過提供對當下這一過渡時代和未來社會的整體解釋增加了自身吸引力。當然，馬克思本人的辯證法思想，無論是對許邦和，還是對當時加入中共的眾多革命青年而言，都是晦澀難懂的。許邦和據以理解辯證法通過的是工人哲學家狄慈根（Josef Dietzgen）。<sup>132</sup>「有人說：『現存的便是正義的』。這其說雖包括了『辯證法』的一半。那一半應該說：『現存的會變成錯誤的，因此必須加以改換。』」<sup>133</sup>許從狄慈根那領悟到，個人應該儘早轉換方向，與時代的轉換同步，並由理論反思加入到更大的反抗鬥爭中去。

為了未來革命以及新社會，許邦和認為，感傷情緒和偶爾流露出來的被動「死亡」想法需要被一種積極犧牲的精神取代：

讀高爾基的《母親》，一直到下午兩點鐘，竟讀完了那篇從人靈魂的最裡層呼出對於鬥爭的美的感覺的女子小說。《母親》底行動，也許是完全由母性愛出發的，然而她自從從「小俄羅斯」那學了讀書，識字，聽了「他們底道理」之後，她已經在個人底的感情的激勵之外，獲得了更燃燒的為正理，為大眾鬥爭，呼喊的意識了！她依在破裂的

<sup>130</sup> 許邦和，〈鞋匠和杜鵑〉，《小朋友》童話版，期 399（1930 年 2 月 20 日），頁 11-17。

<sup>131</sup> 許邦和，《生活錄（三）》，1929 年 10 月 15 日。

<sup>132</sup> 「最使自己高興的是那部很難懂的 Josef Dietzgen 底『從一個勞動者所見的人類的頭腦工作的本質』（按：英譯本原名 *The Nature of Human Brain Work*，當時譯為辯證法的唯物觀）。用心讀了頭數章，下面的便好懂得多……（他那方法本身便是辯證法底）。」許邦和，《生活錄（四）》，1930 年 3 月 23 日。

<sup>133</sup> 許邦和，《生活錄（四）》，1930 年 3 月 23 日。



無產大眾的旗杆下向群眾說，兒子們是為了真理，為了大眾的生活，選擇了走向十字架的路，這是對的！那時候，已經不是純然媽媽對孩子的愛了，是向犧牲者的敬禮，是對統治階級的憤怒，是整個人性在狂吼的了！<sup>134</sup>

這種否定自我、追求犧牲的英雄主義信念融合了許邦和對社會的支配敘事和權力政治的憤恨，並將其轉化為一種面向未來社會的行動熱情。曾經浪漫和感傷的情緒愈深刻，現在行動的熱情和信念就愈強烈。

許邦和追求的信念是一種放棄「小資產階級自我」的棄己式人生態度，他稱爲「造橋者」的犧牲精神。既然整個社會都處於向未來理想社會的演變過程中，除了許邦和自己所仰望的那些知識領袖（如魯迅）外，更需要與自己類似青年一代的共同抗爭，即使他們不能看到或享受到新社會的「快樂生活」。至少，自己可永遠充當這一到達未來理想的「造橋者」。這種對歷史必然性的感受，讓許邦和感到自豪，並得以擺脫情感失敗、家庭束縛以及時代黑暗所帶來的壓抑、憤恨與感傷情緒。「讀罷《煙袋》，重複意識到老賴（按：許在天津的同學和好友）所謂『造橋』者的觀念。而且人也不見得比其他小動物像樣的多少，死一批，活一批的事是值得皺眉的嗎？因此，對正義所在的事，何必不拼命呢？」<sup>135</sup>提供人生意義和歷史發展趨向，理論閱讀提供了情感和智識上的雙重魅力。許邦和希望自己能「像俄國大學生似的，將來做那樣的事。要在小說裡做個主角，至少應該有那樣的精神，新的，強的，勇的形態」。<sup>136</sup>這一情感結構與魯迅「梯子」隱喻中蘊含的精神雖不一樣，但可資比較。<sup>137</sup>

<sup>134</sup> 許邦和，《生活錄（三）》，1930年2月4日。

<sup>135</sup> 許邦和，《生活錄（一）》，1929年4月25日。

<sup>136</sup> 許邦和，《生活錄（一）》，1929年3月28日。

<sup>137</sup> 魯迅給友人章廷謙的信中寫道：「中國之可作梯子者，其實除我之外，也無幾了。」見〈致章廷謙〉（1930年3月27日），收入《魯迅全集》，卷12，頁226。當然，許邦和並無魯迅那種對組織體系、制度的懷疑和對英雄主義本身的質疑。且魯迅本人並不提倡這種盲目追求犧牲的革命衝動，而是採取一種審慎而複雜的「游擊戰」精神。見鍾誠，《進化、革命與復仇：「政治魯迅」的誕生》（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頁110-126。

從歷史上看，「舊社會」的崩潰應該怎樣完成呢？許邦和認為，抗爭可首先從改變日常生活，打破瑣碎和平凡生活那沉默和靜止的一面開始。「在生活史上，應當多留下些 Fair Play 的痕跡才對。Fair Play……最大的目的，便是要使生活變化。」<sup>138</sup>許邦和如此自勉道，青年應該「計畫，擺脫了女孩子，擺脫了爛傷感……向人間的墾荒，是冒險的進取的孩子們起始的時候了！」<sup>139</sup>感傷的情緒和無意義的日常生活讓步於一種奮鬥的、積極向上而又捨棄自我的人生觀，一種新的生活方式。

進一步而言，許邦和期待在和志同道合的同學組織的讀書會中，尋找更平等而友愛的思想空間和情感避難所。在與天津、東北和日本留學的同學通信中，許邦和就多次感歎朋友間平等而相互關照的親密友愛共同體的重要性，並不吝辭彙讚美工人之間或者志同道合的朋友之間的「兄弟愛」和親密感。<sup>140</sup>他認為這一情感遠甚於家庭溫情和男女之間的普遍戀愛。本來，許邦和希望在交大校園裡組織一個共同探討和研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讀書團體。但團體中，並不是所有人都願意讀他推薦的普列漢諾夫等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讀物，在投票中消遣性的俠義小說反而取代了許推薦的理論讀物，讓他再次遭遇挫折。在兩三位志同道合的同學喬魁賢（許在南開中學的同學）、孫傳鈺共同努力下，他們多次光顧當時上海的小書店，期望加入更大的革命組織和運動。<sup>141</sup>

1930 年，在左傾的「立三路線」要求下，2 月分祕密成立的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開始公開宣傳和演講。<sup>142</sup>魯迅因大同盟的活動甚至引起上海教育局的批判和國民黨浙江省黨部的通緝。<sup>143</sup>但這並沒有嚇阻許邦和「飛出去，同魯迅們

<sup>138</sup> 許邦和，《生活錄（二）》，1929 年 6 月 14 日。

<sup>139</sup> 許邦和，《生活錄（三）》，1930 年 1 月 3 日。

<sup>140</sup> 許邦和，《生活錄（二）》，1929 年 5 月 30 日，1929 年 12 月 4 日。

<sup>141</sup> 許邦和，《生活錄（四）》，1930 年 5 月 19 日。

<sup>142</sup> 同盟於 1930 年 2 月 13 日成立，郁達夫、魯迅、馮雪峰等 51 人為發起人。魯迅在幾個大學做了講演，報紙和《萌芽》（第 1 卷第 3 期）月刊均有報導，許邦和獲知此一消息並不困難。參見《馮雪峰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卷 8，頁 45。

<sup>143</sup> 〈嗚呼「自由運動」〉，《民國日報》，1930 年 3 月 18 日，第 4 張第 1 版；甲辰生，〈魯迅賣狗皮膏藥〉，《民國日報》，1930 年 4 月 1 日，第 3 張第 4 版。

一齊幹」<sup>144</sup>的決心與動力。5月1日，許邦和與同學喬魁賢本想參加自由運動大同盟發起的五一示威運動，卻發現除了幾個發傳單的同志外，遊行並沒有多少群眾參與，發傳單的同志也迅即被巡捕捉拿。拿著左聯「五一特刊」的許、喬二人急切地轉往光華書局詢問加入自由運動大同盟的方法。<sup>145</sup>最終許邦和被推薦進入創造社成員傅克興組建的以研習馬列主義為目的的「問學社」（按：很快改由王學文主講，隨後併入「社會科學家聯盟」，簡稱「社聯」）。<sup>146</sup>「社聯」與「自由運動大同盟」都是中共領導的文化界週邊組織。<sup>147</sup>至此，許邦和認為自己終於可以行動直接參與政治和社會改造，不再停留於單純的文字抗爭。<sup>148</sup>在大同盟與王學文熟悉後，通過王的介紹，許邦和於1930年進入左聯和社聯創辦的「文藝暑期補習班」<sup>149</sup>學習，於8月加入中共，並成為徐匯鎮法華鄉黨支部書記。<sup>150</sup>九一八事變後，許邦和參與了中共在上海和南京組織的多次學生運動，1932年即將畢業前夕，許邦和因再次參與學生運動被法租界逮捕，迫於壓力，交大沒有讓許參加畢業考試。<sup>151</sup>肄業後，許一面參加中央銀行的無線電臺工作，同時為中共的上海地下黨服務。本就多病的他在一次肺病治療期間不幸感染傷寒，1934年8月15日去世於上海紅十字會醫院。<sup>152</sup>

<sup>144</sup> 許邦和，《生活錄（四）》，1930年3月10日。

<sup>145</sup> 許邦和，《生活錄（四）》，1930年5月1日。光華書局創始人之一的張靜廬即自稱書局創辦前「上海還沒有純粹的新書店」，見其《在出版界二十年》（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4），頁114。

<sup>146</sup> 王學文，〈回憶社會科學研究會〉，收入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編（下略），《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成立55周年紀念專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頁191-193。

<sup>147</sup> 許邦和，《生活錄（四）》，1930年5月19日。問學社後併入社會科學家聯盟，見許滌新，〈憶社聯〉，收入《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成立55周年紀念專輯》，頁170-171。社聯、自由大同盟、左聯這些團體當時都屬於中共的週邊組織，其背後的領導核心是1929年秋中共成立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

<sup>148</sup> 許邦和，《生活錄（四）》，1930年6月11日。

<sup>149</sup> 暑校以戲劇家洪深為校長，實際主持人是王學文和馮雪峰，主要講課人李一氓、陽翰笙、柯柏年等均為中共黨員。參見王學文，〈回憶社會科學研究會〉，頁1923。

<sup>150</sup> 〈許邦和同志生平簡介〉，上海交通大學檔案館藏內部檔案，總號3796，檔案號RW-許邦和-01。以及許邦和，《生活錄（四）》，1930年6月11日。

<sup>151</sup> 〈函詢許邦和袁軼群被逮情形〉，《交通大學稿》學生雜務卷第4宗，上海交通大學檔案館藏。

<sup>152</sup> 〈許邦和同志生平簡介〉，上海交通大學檔案館藏內部檔案，總號3796，檔案號RW-許邦和-01。

## 六、結語：作為生活方式的革命

威廉·雷迪曾指出，法國大革命前後，革命者對情感表達和親密感的熱盼在革命擴散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試圖通過改革的善意舉動把法國變為人類的情感避難所。<sup>153</sup>革命組織和革命後的理想社會作為情感避難所，無論是想像的還是實際的，對克服感傷的知識青年具有巨大吸引力。畢竟，日常生活中的人大多並不生活在理論和抽象的思想或體系之中。以許邦和為例，「煩悶」只是起作用的初步和普遍化情感，並不具有惟一性，也不是導致眾多知識青年走向政治思考和革命的最直接情感中介。<sup>154</sup>在許邦和加入中共前的心路歷程中，以感傷、內疚、羞恥和妒恨為代表的負面情緒讓他產生了自卑退縮甚至否定自我、厭惡甚至貶抑他人這兩種極端的情感。感傷帶來的反躬自省，讓許邦和審視其「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兩面性。1929 年底，得知其父的生意走下坡路之後，許邦和因感傷引發並內化的邊緣和懺悔意識更加強烈。左翼讀物的大量增加和交大讀書會的受挫讓這一邊緣意識在尋求認同以及改造自我的強烈訴求下，使許邦和意識到自省的局限，並試圖通過加入組織和參與革命行動來克服內心的負罪情結，在同志組成的組織中找到新的平等化的情感表達空間，重塑自我。

另一方面，閱讀世界形塑和強化了許邦和的移情（empathy）和社會同情心，加劇了他對社會不公和腐敗現實的憤懣。進而，許開始將政治和社會參與、抗爭社會現實視為人生意義之重要一環。以愛、友誼和同情為基礎的正面情感，刺激了許邦和基於自然情感和同情弱者的樸素道德判斷，並使他在閱讀左翼理論作品的基礎上找到了整全性學說的馬克思主義。當然，要提及的是，克服感傷和懺悔意識的情感邏輯並不是許邦和走向中共革命的唯一因素，許邦和

<sup>153</sup> 威廉·雷迪著，周娜譯，《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頁 192-193。

<sup>154</sup> 愛、仇恨、同情抑或團結感等不同類型的情感在人們選擇加入不同主義的組織中的作用，學界已有很多積累，不在此列舉。

跨越東亞的人際和訊息網絡以及他與朋友間求「新」、求「進步」的競爭意識也起了重要影響。<sup>155</sup>

此外，許邦和投身革命運動並無清晰具體的政治與社會目標。除了對社會不公的模糊感知和對弱者的道德同情外，五四之後眾多革命青年的那種解放政治的「政治－社會」目標，無論它們是「民主啓蒙」、「個人抑或社會解放」、推翻「反動軍閥」還是「抗日救國」，這些目標在許的日記中並不突出。<sup>156</sup>許邦和偶爾會提及「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權力展現（租界中的藝術展覽、公園管理），間或評點「反動軍閥」以及部分無原則的政客（五四運動中的曹陸章），但是它們僅零星出現。<sup>157</sup>「啓蒙」、「解放」和「社會問題」等宏大目標不再構成許邦和加入革命的唯一重要目標。許邦和這種基於生活方式的抗爭政治，對個體情感表達、情感避難所的內在探索，構成了另一條加入中共及其革命路線的隱密理由。<sup>158</sup>這兩條線索並不衝突，它們在許邦和身上共存。只是，生計問題並不如此緊迫、不需要以加入組織討生活的革命青年，更多關注的是「我應該如何生活」，而不完全是「我應該為誰生活」。蕭邦奇（R. Keith Schoppa）對此有精當的觀察。他指出，「為了理解革命，我們必須把主要的關注點放在日常人生經歷和社會過程」之中，「而不是普遍的意識形態、政治一致及發展」。<sup>159</sup>

<sup>155</sup> 許邦和，《生活錄（三）》，1929年12月10日。許在日記裡提及的資料為イスクラ關於1929年3月15日印刷的〈支那共產黨の最近の活動情勢〉，內有共產國際有關中共六大的活動報告，由在日本留學的兩個好友為他提供。在日本的同學加入青年組織或者理論上的進步對許邦和的刺激，見其《生活錄（四）》，1930年3月10日、6月4日。

<sup>156</sup> 羅志田，〈從新文化運動到北伐的文化與政治〉，《社會科學研究》，2006年第4期，頁139；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頁48-65；許紀霖，〈信仰與組織——大革命和「一二·九」兩代革命知識分子研究（1925-1935）〉，《開放時代》，2021年第1期，頁92-113。

<sup>157</sup> 比如，除了共同的社會苦難，劉白羽、曾彥修等人更多地會強調自己愛國激情和對帝國主義的痛恨。見劉白羽，《心靈的歷程》（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2012），上冊，頁132-175；《曾彥修訪談錄》，頁41-42。

<sup>158</sup> 許邦和正屬於王汎森所言任何一個重大的思想、政治、社會運動中的「半信者」，見氏著，〈探索五四歷史的兩條線索〉，《二十一世紀雙月刊》，期172（2019年4月），頁18-31。

<sup>159</sup> 蕭邦奇著，周武彪譯，《血路：革命中國中的沈定一（玄廬）傳奇》（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提要〉，頁7。

許邦和投身中共革命的行動，借用查爾斯·泰勒 (Charles Taylor) 的術語，源於一種「棄己的英雄主義」信念。<sup>160</sup>這種信念以一種日常生活中彌漫的對現實世界的抗爭心態為核心，試圖打破生活世界中無意義的循規蹈矩行徑，它為許邦和之類的革命青年提供了衝決日常生活之煩悶和感傷等消極情緒的途徑。<sup>161</sup>閱讀左翼理論和加入中共，不僅讓許邦和部分解決了對人生和時代的困惑，克服感傷情緒，更讓他避免把時代問題和社會責任導向為純粹排外仇恨的政治。這一基於自然情感的道德判斷，輔以馬克思主義和其他左翼作品的理論訓練，讓許邦和的激進心態更加突出。許邦和自入黨之前濃厚的「小資產階級」意識和懺悔心，更從情感和心靈層面確認了中共思想整風需求及其巨大效力的可能。<sup>162</sup>許邦和心中所經歷的這種情感和心靈旅程，標誌的只是自我實現的一種未完成狀態，這種在組織和「主義化」的運動之中克服感傷、重塑自我的狀態並沒有一個具體完成的結果，此一過程還將在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中多次再現。

---

<sup>160</sup> Charles Taylor, *Sources of the Self: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295.

<sup>161</sup> 比如馬克思主義史家范文瀾在到達延安後的敘述。見〈從煩惱到快樂〉（1940年12月5日），《中國青年》，卷3期2（1940年12月），頁63-72。

<sup>162</sup> 參見黃道炫，〈整風運動的心靈史〉，《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2期，頁4-26。

## 徵引書目

### 一、檔案、史料

- 〈函詢許邦和袁軼群被逮情形〉，上海交通大學檔案館藏，《交通大學稿》學生雜務卷第4宗。
- 〈許邦和同志生平簡介〉（1981年4月），上海交通大學檔案館藏內部檔案，總號3796，檔案號RW-許邦和-01。
- 《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輯6，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
- 《交通大學校史》撰寫組編，《交通大學校史資料選編（1927-1949）》，卷2，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1986。
- 許邦和，《生活錄（一）至（四）》，上海交通大學檔案館藏，歷史檔案3-469、3-470、3-471、3-472。
- 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編，《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成立55周年紀念專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年。
- 中共天津市南開區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南中星火：南開黨史資料彙編（一）》，天津：中共天津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1991。
- 王文俊等選編，《南開大學校史資料選（1919-1949）》，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9。
- 沈寧、沈旦華編，《歲月如水流去：夏衍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6。
- 季羨林，《清華園日記》，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5。
- 林林，〈哀邢桐華〉，《新文學史料》，1980年第1期，頁103-104。
- 夏鼐，《夏鼐日記》，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 張靜廬，《在出版界二十年》，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4。
- 散木編，《郭根日記》，太原：三晉出版社，2013。
- 曾彥修口述，李晉西整理，《曾彥修訪談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
- 馮雪峰，《馮雪峰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
- 葉篤莊著，孟繁之整理，《一片冰心在玉壺：葉篤莊回憶錄》，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
- 劉白羽，《心靈的歷程》，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2012。
- 鄧力群，《鄧力群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 魯迅，《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 蕭紅著，文明國編，《蕭紅自述》，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14。
-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卷7，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羅久芳、羅久蓉編輯校註，《羅家倫先生文存補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
- 羅章龍，《椿園載記》，北京：東方出版社，1989。

## 二、報刊資料

- 《大公報》（天津），1925。  
《小朋友》（上海），1930。  
《中國青年》（延安），1940。  
《民廿一級五卅紀念特刊——交通大學日刊臨時附刊》（上海），1929。  
《民國日報》（上海），1930。  
《南開週刊》（天津），1925。  
《無軌列車》（上海），1928。  
《新青年》（上海），1920。  
《解放日報》（延安），1943。

## 三、專著

- 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7。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上海：三聯書店，2018。  
王自立、陳子善編，《郁達夫研究資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  
李海燕（Haiyan Lee）著，修佳明譯，《心靈革命：現代中國愛情的譜系（1900-1950）》，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  
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著，翁賀凱譯，《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起源，1919-1937》，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8。  
威廉·雷迪（William M. Reddy）著，周娜譯，《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  
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  
張灝，《張灝自選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張灝，《時代的探索》，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4。  
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著，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譯組譯，《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  
賈長華主編，《曹禺與天津》，天津：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靳明全，《攻玉論——關於廿世紀初期中國文人赴日留學的研究》，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5。  
趙妍杰，《家庭革命：清末民初讀書人的憧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  
蕭邦奇（R. Keith Schoppa），周武彪譯，《血路：革命中國中的沈定一傳奇》，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  
鍾誠，《進化、革命與復仇：「政治魯迅」的誕生》，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



- 羅志田，《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與社會（修訂版）》，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
- Koselleck, Reinhart. *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 Translated by Keith Trib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 Taylor, Charles. *Sources of the Self: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四、論文及專文

- 王汎森，〈探索五四歷史的兩條線索〉，《二十一世紀雙月刊》，期 172，2019 年 4 月，頁 18-31。
- 王晴佳，〈為什麼情感史研究是當代史學的一個新方向？〉，《史學月刊》，2018 年第 4 期，頁 5-10。
- 王晴佳，〈拓展歷史學的新領域：情感史的興盛及其三大特點〉，《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 年第 4 期，頁 87-95。
- 王晴佳，〈口述證言能否成爲歷史證據？——情感史研究對近現代史學的三大挑戰〉，《社會科學戰線》，2020 年第 5 期，頁 104-117。
- 李志毓，〈情感史視野與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研究〉，《史學月刊》，2018 年第 4 期，頁 14-17。
- 李志毓，〈大革命失敗後國民黨左派青年的困頓與探求（1927-1932）〉，《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 年第 6 期，頁 60-69。
- 汪正晟，〈青年自我與延安整風〉，《新史學》，卷 32 卷期 1，2021 年 3 月，頁 117-172。
- 姚玳玫，〈「青年」與 1928 年的革命文學運動〉，《中國文學學報》，期 4，2013 年 12 月，頁 109-132。
- 唐小兵，〈民國時期中小知識青年的聚集與左翼化——以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爲中心〉，《中共黨史研究》，2017 年第 11 期，頁 64-80。
- 唐小兵，〈型塑社會想像的思想資源與概念工具——以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社會問題」系列圖書爲中心的考察〉，《中共黨史研究》，2016 年第 5 期，頁 9-22。
- 馬鳴，〈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中國的早期譯介，1928-1930——以「科學的藝術論叢書」爲中心〉，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頁 132-139。
- 張廣海，〈小資產階級原罪意識的誕生、規訓與救贖——論大革命後左翼知識分子自我認知機制的轉型〉，《文藝理論研究》，2012 年第 4 期，頁 29-35，轉頁 76。
- 許紀霖，〈信仰與組織——大革命和「一二·九」兩代革命知識分子研究（1925-1935）〉，《開放時代》，2021 年第 1 期，頁 92-113。
- 黃道炫，〈「二八五團」下的心靈史——戰時中共幹部的婚戀管控〉，《近代史研究》，2019 年第 1 期，頁 4-22。
- 黃道炫，〈整風運動的「心靈史」〉，《近代史研究》，2020 年第 2 期，頁 4-26。
-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重訪中國革命：以情感的模式〉，《中國學術》，2001 年第 4 期，頁 97-121。
- 裴宜理著，閻小駿譯，〈底層社會與抗爭性政治〉，《東南學術》，2008 年第 3 期，頁 4-8。

劉奎，〈浪漫如何介入歷史：抗戰初期郭沫若的抒情詩學與情感政治〉，《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 年第 6 期，頁 118-140。

鄭堅，〈五四以來中國文學中的小資產階級形象溯源〉，上海：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4 年 6 月。

羅志田，〈從新文化運動到北伐的文化與政治〉，《社會科學研究》，2006 年第 4 期，頁 138-143。

羅志田，〈對共和體制的失望：梁濟之死〉，《近代史研究》，2006 年第 5 期，頁 1-10。

Koselleck, Reinhart. "Introduction and Prefaces to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Translated by Michaela Richter.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oncepts*, 6:1 (Summer 2011), pp. 1-37.

## 五、網路資源

<http://www.shtong.gov.cn/newsite/node2/node2245/node74728/node74749/node74773/node74775/useobjectlai89589.html>（2022 年 6 月 29 日檢索）。

<http://www.yangmingauction.com/goodsdetail.html?auctionid=S15092&code=3551&page=26>（2022 年 6 月 29 日檢索）。

## Sentimentalism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Emotions during Xu Banghe's Road to Communist Revolution (1925–1930)

Lu Hua\*

### Abstract

Dur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emotions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the involvement of revolutionary youth in politics,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and the triumph of the revolu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construct the mechanism of emotion and the mental world of young urban students who had joined the CCP from a bottom-up perspective by analyzing the diary of Xu Banghe 許邦和 (1911–1934), a student at Jiao Tong University. In Xu's diary, one can note that within the post-May Fourth Movement context, new literature was popular and youth faced specific experiences concerning family life and love after the “liberation” of their minds, all of which largely universalized the negative and romantic emotions of boredom and sentimentalism in urban life; moreover, after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of the 1920s, their disappointment with social reality and dissatisfaction with daily life caused their value system to undergo an acute crisis. The popularity of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increased reading of Marxist and leftist materials, and emotional frustration in quotidian life prompted Xu to reflect bitterly on his “bourgeois” background. In the process of overcoming his sentimentalism, he attempted to escape the bitterness and triviality of daily life through reading and theoretical contemplation, strengthening his will to join the political movement of resistance. He hoped to join a more egalitarian organization, a shelter for his emotions, and to seek a new way of life and a just cause for the future through the organization in order to overcome his sentimentalism.

**Keywords:** revolutionary youth, Xu Banghe, history of emotions, sentimentalism, contentious politics

---

\*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